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国防大学 2 062 2828 7

(京)新登字 071 号

361-26°
113:5

大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668-4/K·621

定 价:4.50 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我的革命历程 李 强 (1)
- 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 高登榜 (30)
-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
阴谋的日子里 汪东兴 (56)

人 物 介 绍

- 李锡九传略 刘金田 李月兰 (83)
- “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 陈志凌 (102)

专 题 资 料

- 广东共产党人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周兴樑 (114)

《甲申三百年祭》的首次发表与中国

- 共产党的延安整风 刘昌亮 (134)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郑雅茹 柳建辉 (141)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
“抓革命、促生产” 安建设 (178)

史料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 状况的基本分析 王健英 (194)

民国史·现代史

- 我所了解的张冲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见 ... 西门宗华 (214)

小资料

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抵达北平的第

- 一站 柳林溪 (217)

我的革命历程

李 强

我是江苏常熟人，1905年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我从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至今已近69年。69年中，我的人生之路始终与中国革命之路紧密相联。

五卅运动爆发时，我是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的一名青年学生。那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都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五四运动所点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仍在我们青年人的心头燃烧。尤其是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不少青年因而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5月，在中华大学担任中文教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枪派人来找我谈了一次话。其后他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同时入党的还有张超、陈德华。当时，著名的上海大学离我们学校不远，该校在校长于右任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十分活跃，叶楚枪、邵力子等都经常在那里讲演，我也曾听过他们的讲演，

给我很大的启发与鼓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举国震惊，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城隍庙附近的九亩地新舞台戏院举行了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会上，国民党左派代表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贯彻三大政策；右派代表却无理取闹，从中捣乱。主持大会的何香凝看到会场秩序混乱，就拿起手铃拼命地摇，让大家保持肃静。何香凝讲的是一口广东话，大家根本听不懂；尽管有人翻译，也无济于事，只好宣布散会。在人还没有走完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早成员、团中央执行委员俞秀松跳到台上，大声宣讲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革命，但因当时会场秩序较乱，结果招致了一些人的嘘闹声。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

1925年4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七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日本监工活活打死。10多天后，工友们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附近大学青年学生的支持下，推举了代表向厂方提出抗议和要求。日方不但拒不接受，反而借口没有原料关闭了厂门。数百名愤怒的工人在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带领下，冲进了工厂。日本大班元木川村竟向顾正红连开四枪，顾正红当场身亡，同时受伤的还有10余人。这件惨案就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在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负责人恽代英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各大学都积极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

义的暴行，救援受伤与贫困的工人。我正是在这时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并结识了恽代英、陆定一等同志。5月30日那天，不少学生涌上街头，三五成群在南京路上演说。演说吸引了无以计数的群众，群情激奋，交通为之堵塞。外国租界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武装军警，殴打、驱赶群众，后又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拘捕150多人。南京路一时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五卅惨案震惊了中外。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群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恽代英的领导下，通过学生联合会进行了各种工作。一个星期后，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郭伯和约我谈话，并把我带到共青团负责人贺昌那里，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青团。我当即表示愿意。这样，我就在6月初加入了共青团，并经常出席团的会议。在上海学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学生军事委员会”中，我被推选为军需委员。

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我开始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逐步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此后，我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工作；1925年7月，我由中共曹家渡支部联合会书记陈竹山介绍转为共产党员；11月，我被任命为曹家渡青年团的书记；12月，又被增补为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

1926年初，组织上决定调我任上海浦东青年团的书记。浦东的特点是修船厂多而且集中，码头工人占很大的比重。为了加强与工人的联系，我们办了一个贫民医院、一

所贫民学校，一面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一面补习文化，提高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

尽管浦东的情况非常复杂，条件艰苦，但是我们努力工作，热情很高。当时的团中央总书记、组织部长任弼时来了解情况时，曾给我们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6月，组织上通知让我去吴淞，任吴淞区的青年团的书记。7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又把我调了回来，原来，当时北伐军已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正在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要我研制火炸药，为暴动做准备。

于是，我到化工仪器公司买来石碳酸、硝酸和硫酸等，把这些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自制成黄色炸药。原来还打算做手榴弹，但因条件不具备，只得放弃计划。然而我们还是通过别的方法，弄到了不少手榴弹。

暴动前夕，罗亦农让我回常熟，发展党的组织。仅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就发展了王耕英、曾雍孙、邹逸中等人入党，成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属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直接领导。1927年2月，我被任命为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宣告失败。但1927年3月21日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打垮了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但我在起义前为之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用上了。

起义胜利后，我到上海向罗亦农汇报了常熟的情况，罗亦农指示我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我深受鼓舞。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进驻常熟，陈诚为团长。当时邹逸中任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工作大都通过他出面去做。我们四处贴标语，做宣传，发动反封建的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后又决定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开明士绅钱南山为主席，我为委员。

但是，革命的发展触到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分子的痛处，他们互相勾结，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4月12日到4月15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300余人，被捕的500多人，另有5000余人失踪。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上海区委为了保存力量，决定结束罢工，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我接到组织通知从常熟回到上海。

我先是找到顾顺章，他那时是中共中央特别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又是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他告诉我目前的形势严峻，中央决定迁往武汉，他马上要随中央机关转移。我送他上船后，又去找罗亦农。罗亦农交代我把中央紧急转移后未及处理的事情妥善处理好，其中包括不少枪支、弹药的处理。我按罗亦农的要求，迅速把中央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東西秘密转移保存起来；枪支、弹药转移不便，就在附近挖地深埋。我至今还记得上海交大物理实验室的地下就埋了5支马枪与一些子弹。任务完成后，我也

赶到了武汉。

四一二政变后，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决定组建中央军委。我到武汉时，也正是中央军委成立的时候。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徐以新任秘书。军委下设两个科，即组织科和特科，欧阳钦任组织科长，顾顺章兼特科科长，我担任了特科下设的特务股的股长。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公开背叛革命。8月1日，党中央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终因敌强我弱，南下广东的起义军不久即告失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罗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采取了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右派斗争。那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很猖狂，常常组织人当众演讲，宣传反共主张，蛊惑群众。我们化装以后也混在群众之中，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拔出手枪朝天放枪，结果吓得演讲的右派再也不敢讲了。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从武汉又迁回到上海。我又被留下做善后工作，主要是处理中央办公租借的房子和一些物品。这一工作很快即告结束，我把退房得来的钱物交给地方组织后，于当年10月回到上海。

同月，顾顺章也从武汉来到上海。正当他与老婆张杏华搬家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叛徒。顾顺章已从内部知道此

人叛变了革命，而这个叛徒却以为我们并不知情，还想继续招摇撞骗。顾顺章把他骗到家中喝酒，让张杏华赶紧来找我报信。我急忙带上手枪、斧子、豆腐皮赶到顾家在门外守候。当叛徒醉醺醺地走到门口时，我们里应外合，一齐上去陷住他的脖子，将一卷豆腐皮塞进他的嘴中，他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被我们干掉了。当时对叛徒是绝不能心慈手软的，否则，他就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构。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地下斗争的需要，组建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参加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仍由顾顺章兼科长，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我任交通科长。

行动科在内部也叫“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叛徒，清除隐患。叛徒是我们地下斗争中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决不宽容他们。当时以及后来的如白鑫出卖彭湃，范梦菊出卖向忠发，顾顺章出卖恽代英，都是典型的例子。

白鑫原是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营的党代表，后来到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为乞讨活命，竟主动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为掩人耳目，他与特务串通，乘彭湃出席会议之际，让人把他与彭湃一起抓走，演了一场苦肉计。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以及中央军委负责士兵运动的邢士贞

等。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心急如焚，当他从内线了解到敌人要转解彭湃的确切消息后，便立即亲自组织力量营救。他还指示说：“凡是会打枪的都去！”因为我的枪法不错，所以也被列入人选。但因拟用于这次行动的枪械还涂着防锈的黄油，必须擦净后才能使用。等我们赶到行动现场时，押解的囚车已经过去。

彭湃等同志牺牲后，我们千方百计要除掉白鑫这个可恶的叛徒。在内线的配合下，终于在不久后给了这个叛徒以应有的惩罚。

1928年6月至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国内环境的恶劣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未能出席会议，周恩来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六大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因为我们以往仅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而且不安全。如果通信人员途中遇到麻烦，还有泄密的危险。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一天，周恩来把我找去谈话，要求我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我听后有些为难，因为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而且，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鼓励我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与此同时，军委将特科的四科改为无

线电通讯科，仍由我担任科长。

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交代的任务后，我立即开始了工作。先是到书店里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自学。然后是摸索、实践。那时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我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这样，慢慢摸到了门道，心里有了底。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场上能买到，但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我们就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里定货取货。可是象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只有靠自己做。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郑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一名报务员，到大华后，专门负责为各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在他的帮助下，有时让我安装，有时让我修理，还供给了我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教会了我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我设法弄来了几部机床，其中有刨床、钻床、车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无线电台终于研制出来了。但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正好张沈川曾学习过无线电收发报，于是就请他来操作、检验。张沈川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通报，结果证明我们

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张沈川也成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人员之一。

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中央派我到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先后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目的是选地点和房子，既要利于隐蔽，又要便于工作。结果选中了在九龙弥敦道的一所房子。当地组织为我们物色了一个朝鲜人作报务员；还派了会说本地话的卢彪夫妇住下来作掩护。一切安顿好后，我便启程返回上海。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同行的有黄尚英。我们随身携带着收发报机。海关检查时，我们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的银圆往警察手中悄悄一塞，他心领神会，在我们的箱子上用粉笔做一个记号，看都不看，就放我们过关。也许，他把我们当成了一般的走私者了。

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管理不象国民党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也管不过来。黄尚英试着发了几天报，讯号很稳定。接着，我们就按约定的时间、呼号与频率，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联系，相互通报。因为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差，黄尚英得了肺病。那时的肺病是不治之症，黄尚英不得不返回上海，不久就病死于回浙江家乡的途中。他去世时，年仅20岁。对于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我党无线电事业中第一位以身殉职的同志，我一直深深怀念

着他。

192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了香港，找到了我，询问了有关电台的情况。当时小平同志正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广西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有了香港这部电台，就可以及时将起义的消息与情况经香港报中央。此外，邓小平同志的妻子张希远当时已经牺牲，他托我回上海后帮助安葬。12月11日，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取得成功，消息经香港电台很快转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这对大家也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我回上海后，立刻遵小平同志之嘱把张希远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上还写着立碑人的名字：~~曾幼荷~~。

1930年12月，~~电台被破坏~~。当时曾三是上海中央电台的报务员，~~7日他突然收到~~香港发来的明码电报。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英国朋友发来的，告诉我们电台已被英国~~当局查封~~；~~报务员被捕~~，但处境尚好。我马上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立即通知~~香港停止联络。香港的电台尽管只工作了不到1年，但它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半年之后，我们的报务员也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们没有抓到多少把柄。

也是在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苏区红军在龙岗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初，张的亲属来找我们，说只要我们放人，他们可以拿枪支弹药来交换。那时，红军的枪支弹药非常缺乏，很需要得到补充。我们的电台还不能与江西苏区通报。

周恩来决定派龚饮冰、涂作潮与张的亲属一起赶往江西谈判。然而他俩刚到南昌，就听说张辉瓒已被红军处决，只好中途返回了上海。这一事件也说明在党中央与苏区间建立电台联系是何等的必要。

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带着我们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由上海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行前，聂荣臻专门找他们谈了话，强调了党中央与江西苏区联络的重要性。后来，电台是送到了，但由于功率小，远距离通讯效果不好，上海方面收不到。怎么办呢？5月，正好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二十六军公秉藩部作战，知道他们有一部100瓦大功率的电台。于是，打仗前，我们就派人进行了侦察，告诉部队作战时保护电台，而且一定要打胜。结果一切如愿，我们打败了敌军，完好地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便利用这部电台发报，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有了这部大功率电台，组织上才派王诤负责组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电台大队，并由他担任大队长。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开始有了电讯联络。

1930年3月，党中央曾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军委特科指定由我负责。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张沈川与我担任教员。学员们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我们便采取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专心致志，两三个月后全部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

经过这一期的培训，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据此，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培训任务交由顾顺章和我负责，由我与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上一次的经验，我们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或开设两个电器商店作掩护的办法。很快，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又一次办起了训练班。这也是我们党办得最早的、正规的无线电训练班。这一期的学员有16人，教员的力量也更强。尤其是几位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同志回国后被调来担任教学骨干，使训练班如虎添翼。

12月17日上午，学员们正在上课，突然一批侦探、军警闯了进来，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及器材，拘捕了20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与我不在现场，因而幸免于难。这些同志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虽被严刑拷问，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16人才获释出狱，另有4人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死于狱中。16位同志出狱后，又重新投入了革命斗争。

上海的地下斗争真是艰险曲折。“福利电器公司事件”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的严重事件。

顾顺章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人，五卅运动前就入了党。五卅运动后被指定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后又当选为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特科的科长，负责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1931年4月，他亲自护送张国焘经武汉潜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归

途中，他竟违犯党的纪律，擅自在汉口以化广奇的艺名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王竹樵指认，被国民党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刻叛变，并要求把他秘密解往南京见蒋介石。武汉的特务机关急于邀功请赏，把这一情况连发6份特急绝密电报给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幸而被打入敌人内部，当时担任徐恩曾秘书的钱壮飞同志首先得知。钱壮飞抢先把消息报告了上海的党中央，随即脱身而去。周恩来、陈云、陈赓、李克农等同志面对险恶形势，机智勇敢地领导特科人员日夜奋战，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转移了中央机关，并及时通知了有关同志，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把我领导人一网打尽的企图，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损失。我也是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才搬家转移的一个。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钱壮飞同志，没有他的忠诚、机警和及时报告，我们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在中央军委派陈寿昌通知我转移的同时，周恩来经过郑重考虑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工作和深造。临行前，蔡叔厚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到天津后去找他的一个亲戚，他会帮助我。我乘轮船到天津后找到了他，在他的帮助下，去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办了签证与护照，并买到了到柏林的火车票（中途可以在莫斯科下车）。这是因为当时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只能这样“曲折迂回”地赴苏。1931年6月，我登车北上。车到哈尔滨，又经苏联领事馆签了字。这时正好碰上大学的同学周奎，他在哈尔滨的海关工作。在他的关照下，我很快

又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到了莫斯科，我立即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共产国际所在地。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询问了情况后，马上通知了李立三。李立三把我接到他住的旅馆里，给了我一些生活费，让我先住下，工作以后再说。我看李立三当时的情绪不高，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了批评，共产国际对他已不再信任，他对自己以后的工作都不清楚，自然也很难再为我作具体的安排了。

1931年11月，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政治上以“左”反“左”，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对稍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认为我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是顾的死党，对我极不信任。他曾私下对人讲：“不能让张工程师（化名）上东方大学，也不能让他回国，回去以后，他是要背叛革命的。”

这样，我就被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但还是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里，每天到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上班。从此，我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强”，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32年，我被调到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员，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学员中有美国、英国、捷克、南斯拉夫等国的人，因此我基本上用英语讲课，他们也都能够听懂。中国学员大都是东北的游击队员，来自东北抗日联军各支部队。他们经常在中苏边境打游击，被敌人追得无路可去时，就跑到苏联这边来了。这样一直到

1934年，我教了几批学员，最后一批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通信科学研究院。

在通信科学研究院，我下决心研究无线电理论。一次，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份关于美国制造的菱形天线的报道。报道中只有试验的结果，没有理论的分析。我知道，这是美国人的特点，他们往往只注重试验，而不重视理论。我是搞基础科学的，对于数学有特殊的爱好，于是就想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天线理论，论证在菱形天线里，电子、电磁波是怎样集中到一起的。我整整研究了1年多，用英文将研究成果写成《发信菱形天线》一文。我把论文交给了研究院，苏联人很感兴趣，因为其它国家还没有关于发信菱形天线的理论论证文章。1935年，一位乌克兰人把我的论文译成了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技术出版局出版的《天线之电气计算》汇刊上。苏联通信科学研究院鉴于我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把我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称我为无线电专家。我的论证方法，从此被人称为“李强公式”。

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的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已经发表了十几个春秋。其间，世界各国的无线电技术突飞猛进，但未出我所料，菱形天线与德律风根式天线已成为远距离越洋短波通讯中主要的、最有效的两种发射天线。1950年，我的论文被译成中文在《电信建设》专刊上发表，我被授予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1955年，我又被中国科学院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电子

研究所所长。

1937年，从中国和其它国家又来了一批无线电学员。于是，我又回到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训练班授课。训练班为配合教学，设有一部小机床，可以加工一些小零件。我们利用它动手制作零配件，既节约了开支，又增强了实践的能力。我是一个兴趣广泛，愿意学习的人。训练班附近有一个木材加工厂，课余我常到那里学做木匠活；训练班上经常放电影，我就一边帮助放映员工作，一边学习放映技术。1938年我回到延安后因此成了延安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照相、冲洗、放大这些技术也是在苏联时学会的，后来在延安也都派上了用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使我们忧心如焚。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经组织批准，我与最后一期训练班的中国学员一同回国。我们12月12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五六天后才到乌兹别克的首府阿拉木图。在阿拉木图停留了几个小时，又继续赶路。到了迪化（即乌鲁木齐），我们等了1个多月，才等来苏联的一架轰炸机，我们才又乘飞机到兰州。然后再改乘汽车到西安，最后终于抵达延安。

我到延安时，正赶上中央军委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重新组建军事工业局。组织上考虑到我曾是理工科大学生，以前搞过火炸药、手榴弹、无线电，并担任过军委特科四科科长等经历便把我作为军工局与三局的负责人人选之一。不久，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军工局局长滕代远特地约见

我。要我与王诤一起担任军工局的副局长。因为离开祖国多年，国内的情况尤其是解放区的情况不太熟悉，我感到有些困难。滕代远却说：这可以和王诤同志一同搞，由你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这样，我就接受了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任命我为军委三局副局长，兼顾我党我军的无线电建设事业。

当时军工局的家底确实很薄，管辖之下稍象个样子的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柳树店兵工厂。名为工厂，实际上只是一个修械所。抗战爆发后，人们寄希望于延安，不少外地工人陆续赶到延安来。柳树店村小，容纳不下，又不利于隐蔽与安全生产，中央军委遂决定将兵工厂迁至离延安约 36 公里的安塞县茶坊。兵工厂在那里一驻就是 9 年。

边区军工基础薄弱，资源缺乏，既缺设备器械，又缺少人材，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尽管沈鸿到延安时带来了一部分机器设备与原料，但还远远不够。从长远考虑，我决定与沈鸿亲赴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再购买一部分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我们在一家机器厂定做了 10 部车床，还在其它地方购买了 30 支步枪，以及铜铁、硫酸和铝锭等材料。后来，我又两次赴西安购买原材料。

军工局先后隶属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后又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其宗旨与目的却始终如一。这就是发展军工生产，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我一直主张让知识分子充分施展才华，有职有权，

并提高他们的待遇。象沈鸿、钱志道、徐驰等等都先后担任过厂长。这些做法，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都得到了肯定与总结。同时，我也一直主张生产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那时有的同志盲目主张搞大军工，幻想飞机满天，坦克遍野。毛泽东同志不无幽默感地批评说：我们连生产锄头的铁都很少，更不要说去搞飞机、坦克了。我们把生产的重点放在步枪、掷弹筒和掷弹筒弹、75和82迫击炮弹、手榴弹、发射药和炸药上。这都是当时战争最急需的物资。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等同志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就提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并说“造枪并造土枪亦好”。兵工局为此全力以赴。没有原料，用从山西同蒲路抢运来的道轨代替；没有专用设备，我们就用手工加工。1939年4月25日，我们终于生产出了边区的第一支七九步枪。

我们初期生产的手榴弹都用黑火药代替炸药，但因黑火药爆燃速度慢，常常收不到应有的效果。1943年9月，紫芳沟化学厂掌握了能用汤姆逊法生产强棉，钱志道便想到以强棉代替黑火药，因为强棉的爆速要大大高于黑火药。经过试验，证明了它的成功。我们一共造出4万多枚手榴弹，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6月，我又兼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院长。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是于1940年9月成立的理工科高等学府，设有物理，化学和地矿系。它为我党

我军培养了不少科技人材。

抗战胜利以后，军工生产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兵工厂的大部分技术骨干陆续支援其它解放区。因为是走出高原山沟，大家习惯称之为“下山”。到1946年6月，绝大多数原有的技术骨干已先后“下山”，一批批新学徒又补充进来，各厂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时，国民党又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对付胡宗南部队的突然袭击，提高军工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便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为此，我及时提出了“兵工厂包工计划总列草案”，决定改革管理方式，以促进军工生产。草案中体现的原则主要有军民兼顾、先军后民、完成任务、培养学徒与最低要保证职工固定工资等。其实实施办法是：钳工采取线包，以枪支为单位；机工、木工、红炉采取点包工，以件为单位；动力以时间为单位，并采取事先签订包工合同的办法来制约双方。草案实施后，效率大大提高。以步枪修理为例：以前平均要20小时才能修一支；现在提高到只要8小时就可修一支，最快的甚至只要4小时。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兵工生产也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为了安全生产，同年10月我建议把第一兵工厂迁往瓦窑堡，并更名为瓦市兵工厂；同时在茶坊一厂附近深埋了大量机器，军工局机关与物资也随之迁移。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的，避免了1947年3月胡宗南占据延安后的大的损失。

1947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决定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我奉命到一些解放区去调查军工生产及工业资源的有关情况。我先后在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并对各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兵工生产提出了一些建议。

1947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兵工会议。朱德、刘少奇都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会议确定了兵工建设的总方针，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要求制造质量好、成本低的武器弹药。会议对以后兵工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到了1948年，我又担任了领导制造广播电台天线设备的工作。因为原来设在延安的新华通讯社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进行过几次大转移，先后迁到瓦窑堡与西柏坡。新华社每到一处，事先都要建造天线设施，这是我的本行。中央迁至西柏坡后，很快由我主持在井陘煤矿选好台址，修建了半地下窑洞，安装好电台，并修建了高达50公尺、颇为壮观的天线铁塔。那时廖承志任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主要负责编辑工作。我任副处长，主要负责电台与天线设备的建造。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组织上让我到南京去接收国民党的电台，同行的还有卢克勤与陆亘一。一路辗转曲折到达南京后，发现南京电台只有两部机器，一部是20千瓦的中波，一部是7.5千瓦的短波，没有什么大用。此时上海也已解放，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直

奔上海。

在上海闵行路，我们发现了一家国民党官办的无线电广播器材厂，里面有不少我们所需的東西。经与上海军管会领导商议，同意把工厂上交给中央，迁往北京。卢克勤于是着手组织搬迁，并担任了该厂第一任厂长。

1949年7月18日，我第一次进北平，到广播事业局机关工作。这时，廖承志已调往侨务办公室，广播局的工作交给了我。胡乔木那时担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负责广播事业局、画报社、新华社的工作。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为集会作好广播扩音的准备。

我们手头的设备比较落后，除向有关商店、公司租来一部分以外，我们又从部队调来了一些他们新缴获的扩音器。这种扩音器有9个小喇叭，所以大家称之为“九头鸟”。9月，我们开始在长安街沿途拉线；9月中旬开始试播音。不料却引来许多意见，说我们的广播声音太大，干扰了沿街单位、部门的日常工作。于是我们又努力改进，将一些器材重新调配。

10月1日这天，我一大早就赶到天安门城楼上调试，效果不错。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一开机器，我大吃一惊“扩音器竟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噪音。我们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鸣。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摘下头上的帽子扣在了麦克风上，噪音果然没有了。此时，毛泽东同志健步走到了麦克风前，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后，毛泽东同

志又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将整个庆典推向最高潮。

建国之初我在担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同时，还兼任了邮电部无线电总局的局长。那时，我们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架设了北京至莫斯科的有线电话。这条电话线长达12000公里，穿越了千山万水，终于在1950年12月12日建成并通话。它对沟通中苏两国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同志出访苏联到达莫斯科。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等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政治、经济等问题。周恩来知道我对机械、军工、电器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正好我当时也在莫斯科与苏方签订第一个通邮、通电讯协定，就要我去担任谈判代表。一天，我在大使馆见到了毛主席，他问我：“你是否可以改行搞贸易？”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便脱口答道：“还是让我搞科技吧！”毛主席见我这样说也就没有再谈此事。

在我准备回国时，碰到了李富春。李富春要我与他一起搞外贸，并立即派人把我的行李物品搬到了他的住处。在与我交谈时，李富春摆了3条理由：一是我在苏联工作了6年，懂俄语，对工作有利；二是懂机械知识，苏联对我的援助主要是机械设备；三是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我去过交易所等，懂一点经济知识。因此，我被留下与首任外贸部长叶季壮等一起参加了与苏签订第一个中苏贸易协定的有关谈判。中苏签约后，我才与李富春、叶季壮一起回到北京。

那时，中苏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加强这种关系

和贸易往来，苏联把派驻我国使馆的商务参赞升为副部长级。鉴于礼尚往来与对等的外交原则，我国也在物色驻苏使馆商务参赞的人选。陈云同志考虑再三找到了我，要我尽力为之，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只有答应。周总理立即通过政务院任命我为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使馆商务参赞。从此，我开始了长达 29 年的外贸工作生涯。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繁重、艰巨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建设急需大量的机器设备。为此，外贸部专门成立了成套设备局。那时，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有 156 项，约合 44 亿美元。他们还派了不少专家来我国，我国也派了不少人到苏联去学习管理与技术。他们的援助在我们的基本建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后来，情况却起了变化。到 60 年代初期，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央提出了由东向西转移的方针。力求对西方施加我国的经济封锁实行突破，打开缺口，这一方针由国家计委与外贸部具体实施。为此，在中央领导下成立了新技术小组，重新设立成套设备局和技术进口公司。我是主管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的。我们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也在谋求同我们往来，于是我们就与之接洽、商谈，先从那里进口了第一套成套化纤生产设备；继而又从荷兰、英国引进技术；后又由我经手与 40 多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我还亲自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 20 多个国家。这些往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打开了一个新局

面。

到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中央原定工作部署与设想，但我个人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让我参加援越领导小组，主管援越工作。周总理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了使我安心工作，他想了许多办法。比如，他让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李伦专门搬到我的办公室来办公，一方面是为了协调军队与外贸部门对援越物资的统一分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我不受冲击。这样，周总理还不放心，又派了一名军人来做我的秘书，到时候可以由秘书出面阻止造反派的胡搅蛮缠。

援越工作非常复杂，从1965年6月开始，我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和船运等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着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机场、公路等任务。到1968年3月，我国先后派出援越部队共32万人，最高的年份，达17万人。加上无偿地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与作战物资，可以想象工作的艰巨与繁忙。1969年冬，我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穿越胡志明小道，深入到越南南北交界的17度前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我们在政治、道义，乃至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无私而又巨大的支援，仅物资一项就折合180多亿美元。

1973年，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我被任命外贸部部长。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7个年头，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感觉到了国家经济实际上已经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更加猖狂。外贸部一直被他们骂为“卖国部”，开展工作自然更加困难重重。

好在当时的外交工作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决策下，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并扩大成果打开了外交工作新局面。这给了外贸工作一个难得的机遇。而且，当时的国际金融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元成了国际货币市场上的通用货币。从70年代开始，日本、联邦德国崛起，美元下跌，日元、马克升值，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动摇，美元开始与黄金的价格脱钩（原来25美元可以兑换一盎司黄金，到1973年3月12日比价已达38美元）。黄金是最稳定、也是最敏感的商品，它与美元的脱钩，就象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撕开了一个大缺口，可以为我们所利用。

于是，我向周总理递交了一份报告，全文只有200多字，提出要利用时机，扩大外贸范围，为国家多赚取外汇。周总理立刻签署了意见批转到了李先念那里。周总理的批语说：请先念同志支持，李强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为此，中央成立了价格小组，由外贸部牵头，有计委、银行、纺织、轻工、商业等部门的同志参加，由我具体负责，陈云同志指导。贸易研究所也被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研究市场价格的信息。

有一次，我们与“船王”包玉刚合做一笔生意。包玉刚与世界各国的财团，尤其是与日本的金融界有密切的联系，有一些可靠的信息来源，所以很自信。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判定行情已经涨到顶峰，于是作出决定“收”！而我们根据情况，经过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是：行情还将持续上涨几天，并把情况向包玉刚作了通报。包玉刚不相信，反过来劝我们与他一起提前“收”。但我们还是坚持了几天，结果我们比他多赚了不少钱。包玉刚很不理解，后来见到我就问：你们的情报怎么比我的还准？我告诉他：我有一拨人在专门研究，有后盾。包玉刚折服地说：你们比我强！

我始终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重视与关怀。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周总理一再顶回“四人帮”一伙对外贸工作的诬蔑与攻击；连续9年的“广交会”，周总理都亲自指导；他还经常深夜来视察我们的工作，与大家亲切交谈。1973年，他手术出院后第一次主持国务会议，讨论的就是外贸工作。周总理的鼓励与鞭策是我努力工作的巨大动力。

以往的计划经济，工作很死板，一切都要靠上面的指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领导一批下来你就得买，价格最贵也得买。否则指示的期限一到，计划就作废了，用货单位也不干。从我们的外贸总额说，数量并不大，但我们是一个大国，外贸又只有一个统一的口子，因此一具体到购买某一种产品，往往就是一个大主顾。外国商人看到我们这个特点，就有意欺负我们：我们一进钢材市场，钢材价

格就涨；我们一进粮食市场，粮食价格就涨……为了减少国家的损失，我们想到了利用期货交易。

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贸易方式。它通过双方的签约，确定买卖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规格。卖方应随时供货，买方可随时取货。价格下落时可以买进；上调时就搁在那里。产品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根据行情转手卖出。它带有保值的特点，对我们尤其有利。

这样，外贸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粮食、钢材、石油、煤炭、机械、轻纺、化工，甚至黄金生意等我们都做。有买有卖，有进有出，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从1973年忙到1975年，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出来，我在门口碰到了李先念同志。他告诉我，你们干得不错，赚了30多亿美元。

不久，周总理病逝，这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使我怒不可遏的是“四人帮”一伙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攻击、诬蔑周总理，总理逝世后又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我忍无可忍，不顾他们的禁令，亲自以部长名义下令外贸部降半旗以志哀悼。在得知“四人帮”磨刀霍霍，将要发生天安门事件确切消息的前夕，我仍然要外贸部的职工把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赶紧送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了悼念周总理，为了表达亿万人民的心愿，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1981年，我离开了工作岗位，不再担任外贸部长职务，这时，我已经76岁。

退休以后，我仍然很忙。我是国务院的顾问，有不少活动要参加。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我常与知识分子打交道，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待遇低，条件差，任务重，往往是“超负荷运转”。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要尊重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条件，让他们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1984年底，我专门去苏南一带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作了调查。苏南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好的地区。但即使如此，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住房紧张，待遇偏低，对知识分子不能充分信任、放手等。在调查报告中，我专门写了一句呼吁“知识分子家里起码要有一间没有老人、小孩的房子供其学习、研究才好。”这自然不是苛刻的要求，但也并不容易做到。我希望现在的苏南情况会比1984年好得多，我也相信苏南在多方面一定会有飞速的发展。

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无愧无悔，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

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

高 登 榜

(一)

我和毛泽民同志是1935年在陕北瓦窑堡中央国民经济部里认识的，而后成为他领导下的普通一兵。毛泽民同志对我的革命生涯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在瓦窑堡落下脚。人员要立即安顿，粮食、被服、器械等急需补充，后勤保障工作急需迅速落实。

中央国民经济部面临异常艰巨的任务。

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一到瓦窑堡，立即提出要从地方紧急抽调一批同志到国民经济部工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西北工作委员会技术处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国民经济部工作的。

当时，中央国民经济部驻在瓦窑堡的几孔简陋的窑洞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十分繁忙。我报到那天，时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同志正在院子里对几位同志布置工作。他看过我递上的介绍信，立即热情地招呼我走进

他的窑洞，递上一碗开水，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向我详细了解了瓦窑堡四周土特产，如油、盐、粮食、矿产等情况。毛泽民衣着俭朴，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交谈之中，他亲切信任的神情立刻感染了我。

紧接着分配工作，毛泽民部长安排我到经济部工矿科。工矿科主要负责造纸和挖煤两方面的工作。毛泽民让我管煤矿，说：“你的任务是管煤窑，把煤挖上来，运到这里，让家家户户都能烧上饭。”毛泽民三言两语，便把一件事说清楚了。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感到：再大的事情，他也能化大为小，把复杂的道理简化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语。

我早出晚归，管理瓦窑堡附近的小煤窑。煤矿的管理说到底就是挖煤和运煤两项，人工挖出煤，再用肩扛牲口驮，送到供煤点。每到傍晚，我踏着晚霞的余辉返回经济部，一路上只见黄土高坡的簇簇村落，炊烟袅袅，正是做饭的时刻。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化成千家万户炉灶中的缕缕火焰，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记得有一天，毛泽民托人通知我回经济部，并要我立即到延长油矿和永坪油矿。毛泽民说：“你是本地人，我派你到这两个油矿上，了解油矿现在如何进行生产，矿上有多少技术人员，多少熟练工人，炼油厂现在能不能使用。把情况弄清楚后立即告诉我。”从他严肃的神情中，我猜想中央机关的用油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我离开经济部，用了两个星期时间跑遍永坪、延长两个油矿，详细了解了油矿现状、人员配置等。调查结束后我返回瓦窑堡向毛泽民做

了汇报。

毛泽民听完我的汇报，立即提笔写道：“博古同志，我部派高登榜同志去两个油矿做了一番了解，那里的生产基本上是停顿的。国民党矿产资源委员会的20多名技术人员还在关押着，这些人员是油矿生产的骨干力量，请求你批准释放。”国民党矿产资源委员会的这批石油技术人员是中央红军进入瓦窑堡时，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他们滋事破坏，将他们关押起来的。

博古同志“同意释放”的批示很快送来了。毛泽民喜笑颜开，对我说：“这下好了，技术人员有了。”

毛泽民指示当地政府立即给这批释放出来的技术人员洗澡、理发、换上衣服，分配窑洞，解决吃饭问题。然后给他们放假一个星期。这批工程技术人员奔走相告，庆幸得到自由并有了发挥特长的机会。

毛泽民把原勘探处事务所所长严爽请到国民经部，同他一起研究了恢复和发展石油生产的问题，并委任严爽为石油厂厂长，这使严爽深为感动。一星期后，这批技术人员高高兴兴地回到永坪油矿着手恢复生产。

过了两个星期，毛泽民通知我随他到延长油矿，他要同全体技术人员见个面，吃顿午饭以表心意。

听说毛泽民要到油矿上看望大家，技术人员受宠若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当他们亲眼见到毛泽民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相信了，心里很受感动。

毛泽民部长来到院子里，同大家热情握手。吃饭时，他

给大家斟上酒，自己端起小酒碗，诚恳地同大家谈起来。毛泽民说：“你们都是技术人员，过去同国民党合作，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我们是能够合作得很好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出油，出油就是为了打胜仗！”毛泽民端起小酒碗，给大家逐个地敬酒。

这充满信任和情意的一顿饭，其美好记忆长留在大家的心底里。

后来这批石油技术人员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严爽后来到了玉门油矿，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后来调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

为了保存自己，发展生产以自救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红军从进驻瓦窑堡开始，一直到后来进驻延安，一直坚持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制度。这与毛泽民部长的提倡不无关系。

为了解决瓦窑堡军民的吃菜问题，毛泽民费尽了脑筋。靠花钱买菜，只能解燃眉之急，天长日久不是个办法。毛泽民说：“人不能没有蔬菜，这菜从哪里来呢？经济部不能保证蔬菜供应，只能靠我们自己来种。村前村后有不少空地，完全可以利用起来。敌人一天不来，我们就一天发展生产。种豆种菜，自给自足。即使敌人来了，我们转移到

外地，这些菜长大了，仍能让当地百姓食用，这不也是很好的事吗？”毛泽民的主张很受大家的拥护。

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每逢星期六下午，瓦窑堡村前村后和河边热气腾腾，机关干部和红军战士拿着工具，走出窑洞，开始义务劳动半天。不少机关干部分成小组，专门找没人要的荒地挖掘、平整，整理成一块块方圆不一的小菜地，播种、浇水，轮流进行管理。陕北的蔬菜品种主要是小白菜、青葱、红白萝卜、芹菜、土豆等。当地老百姓看到我们开荒种菜，十分热情地来地头帮忙，指导如何播种，如何施肥，并为机关提供蔬菜苗和种子。机关人员和战士们很快种下了第一批蔬菜。毛泽民一有空，便到田间地头，看看经济部的菜地又有哪些变化。当青翠欲滴的蔬菜喜获收成的时候，田间地头洋溢着欢悦气氛。说来也巧，红军刚进瓦窑堡时种下了一大批蔬菜，当绿叶正长出的时候，东征已经开始，战士们忍痛放弃菜园，投入紧张的战斗。待东征结束，中央机关返回瓦窑堡时，不少战士马上想起那菜地，念叨自己劳作的蔬菜不知怎么样了。林伯渠、毛泽民和我是一个劳动小组，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自己的菜地。到地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蔬菜长势茁壮，已经可以采摘了。其他的小菜地也是瓜果累累，收成在望。小小菜地为机关上下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连日来的疲劳被驱散得干干净净。

生产开展之后，毛泽民在经济部会议上提出了利用义务劳动日多为当地百姓干活的建议，如帮助群众挑水、种

地、担肥、秋收等，尤其要帮助军烈属和孤寡老人。这种风气后来在根据地广为流传。每到劳动日，机关分片包干，一个厅局负责一个村，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干。村中的军烈属和孤寡老人家中缺少劳动力，我们事先了解之后便主动上门，帮助他们挖地、种五谷、种蔬菜、挖地窖，挑水、施肥。到了年关，帮助群众推磨、滚碾、做豆腐、磨荞麦、磨油面，干得热火朝天。毛泽民部长工作繁忙，但每逢助民劳动他从不落后，也干得很拿手。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军民关系非常融洽，老百姓把我们当作知心人，一边干活一边向我们诉说家长里短，有的群众家里买不起火柴和咸盐，春种时节买不到菜籽、瓜苗，我们知道后就代群众买了送去。军烈属家中生产尤其困难，我们也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难题。这样，我们同群众联系密切，情同一家。每次去群众家中干活，我们自己带上干粮，中午时在群众家中烧些开水，算作一顿午餐。群众往往又为我们煮南瓜饭和土豆，使我们盛情难却。回想在陕北时期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至今令人留恋神往。

(三)

1935年冬的一天，毛泽民突然找到我，要我去把安定县（今子长县）委负责同志请来，一起商量从瓦窑堡附近腾出十几孔窑洞，另有用途。一说要腾窑洞，我们便猜想是有重要客人或领导要来了。第二天，安定县委领导带领

毛泽民等几位同志在县城四周一边看地形，一边选择靠山、隐蔽、飞机轰炸不到的窑洞。这些窑洞的主人一听说中央红军要借用，十分热情，二话没说便立即收拾物品，扶老携幼，分散到其他住处。仅用半天时间，我们就选定了十几孔窑洞。看到陕北人民无私忘我地支援中央红军，毛泽民感动地说：“多好的人民，有他们的支援，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回来的路上，毛泽民又筹划了集中大米、苞谷等粮食，借几位老乡帮助做饭等事宜。看着毛泽民忙碌的身影，我不由猜想是谁要来呢？

过了两天，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军委进驻了瓦窑堡。尽管行动对外保密，但消息还是传开了，老百姓非常高兴。同毛泽东一起来瓦窑堡的还有周恩来等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瓦窑堡顿时沉浸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之中。为了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毛泽民在经济部会议上一再强调要“注意保密，不要走漏风声，敌人可能就在眼皮底下。”后来我们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正在筹划率部打过黄河进行东征，力图打破根据地和红军目前被反动武装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等重大问题。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东征大局已定，国民经济部紧张地忙碌起来，毛泽民

召集会议通知各个部门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并亲自告诉我：“延长、永坪两个油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要保护起来。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这里一旦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让他们随大部队一起走，枪林弹雨，生死未卜，反而不利于他们的安全。可通知他们善自为之，多加保重。也可协同当地人民政府同敌人打游击。”他还叮嘱我去油矿将转移和安置的事情料理好后立即赶回机关待命。我不能不深深感受到毛泽民宽阔的胸怀和工作的细致入微。而我到了油矿，宣布了毛泽民的决定并做了安排后，当这批技术人员得知毛泽民还在关心着他们，也非常感动。

当我办完油矿安排的事赶回瓦窑堡时，毛泽民正伏在桌上点着小煤油灯写着什么，一见我回来，便叫住我：“登榜，等一等，你去送一封信。”一会儿，毛泽民将一封信交给我，要我从后门走，直接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以往送信，皆由通讯员传送，这次却例外。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拿了信立即往毛泽东主席的窑洞上赶。到了毛主席居住的窑洞前。警卫战士立即将我引入毛主席的办公室。

毛主席正抽着一支纸烟，坐在板凳上沉思着。桌上的小灯闪烁着微光，四周十分安静。见我进来，毛主席点点头，指着对面椅子要我坐下。我掏出毛泽民部长的信交给毛主席，在毛主席看信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粗布大衣，削瘦的面孔上神色刚毅。主席看完信后，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三行字，折好交给我后，说：“你回去交给泽民！”我向毛主席道别后随警卫出来，骑上马立即返回。毛泽民在

经济部正同几位领导在研究事情，我将信交给他后便离开经济部住地。

东征开始后，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路过延长油矿，就住在石油厂工人何延年腾出的窑洞里。当毛主席知道住的是石油老工人腾出的窑洞时，感到很高兴。他在这孔窑洞里，多次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在百忙中还把延长油矿的同志们找来了解矿上的生产情况。我告诉毛主席，油矿距离这里不算远，请毛主席到石油厂里看一看，顺便在矿上吃一顿家常便饭。毛主席欣然应允。我和油矿的同志商量，请毛主席吃什么呢？小米粥、羊肉泡馍、饅饅、锅盔……这些食品都不足以表达油矿工人的心意。我想起毛泽民曾说过，湖南人喜欢吃狗肉，还经常吃辣椒驱寒，于是我建议焖一锅狗肉当作午饭，众人皆表同意。我们立即派人去乡下买回两条狗，请来一位老厨师精心烹调，特别关照他多放一些辣椒，用温火慢慢炖着。这天中午，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油厂，看了工人们采油和炼油的情况，亲切询问油矿工人的生活、家庭情况。开饭的时候，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炖狗肉摆在桌上，毛主席闻到肉味，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主席一边吃一边对身边的毛泽民说：这是我来陕北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四)

随着东征步伐的加快，国民经济部的工作运转也高度紧张。

一天傍晚，毛泽东主席的通讯员送来一封信，毛泽民看信后眉头紧锁，在窑洞里踱起步来。

晚上9时左右，毛泽民通知经济部全体同志开会，他亲自下达命令：“今天晚上，枪不离手，马不离鞍，时刻准备出发。地方的同志不准回家。这次行动要保密。”军令如山，大家摸黑返回各自岗位，守着各自的牲口和物资等待出发。好在那时大家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什么时候走，走到哪里，什么时候回家，一切都听从组织安排，几个月不回家已是常事。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团团包围了瓦窑堡，并且占领了附近的山头，企图偷袭在瓦窑堡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夜黑如漆，谁也估计不到敌人什么时候发起袭击。到了夜半时分，我们忽然听到枪声，牲口也开始不安地骚动。上级通知下来，要我们立即撤出瓦窑堡整队往西边走。我们牵着骡马，带着经济部收存的财物开始赶路。走了一程，在路边的树丛下，借着微弱的光亮，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席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神态自若地看着车马来往。毛泽民正欲上前同毛主席说话。毛主席看见了，挥挥手，示意泽民同志不要过来，让我们抓紧往西走。戎马倥偬，毛主席冷静

泰然的大将风度，使我们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

这天晚上，我拉着满载物资的大骡子，在经济部行列中行进，四周全是向前涌动的车马和人员，只听见马蹄着地和人的脚步声。夜色浓浓，在急急行走中，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四周似乎全是些不认识的战士，装备也不太一样，黑灯瞎火，我不禁有些心慌。想回过头去找，四周黑漆漆一片，时间也不允许，这可怎么办呢？我心里直嘀咕。又一想，反正都是中央红军，走的又是一条路，出不了大问题。于是，我随着这支不知是隶属哪里的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赶。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天色渐渐透出光亮，左右一看，我居然走进陕西省政府所属的队伍里来了，而马明方主席就走在我的前面。

明方同志也发觉自己队伍中多了一头大骡子，不禁感到奇怪，回头看了几次。当看清楚之后，不禁笑起来：“嗨，登榜呀，你怎么混进我的队伍中来了。不错嘛，捡了个大便宜，人和牲口我都要了。”马明方用手拍拍骡子，诙谐地连连说：“不错不错，这牲口还是蛮壮的。”

明方同志是著名的陕北领导人之一，在当地很有威望。听他这么一说。我哭笑不得，拉着大骡子随他走，心想，毛泽民部长还不知怎么着急呢！

后来才知道，毛泽民一路上就发觉人数不对，他一边走，一边小声地问着：“登榜呢？登榜呢？”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毛泽民在天透亮的时候，前后查看一遍，确认我已走失，不禁着急起来：“糟糕糟糕，这个登榜可是去

不得呀。”泽民同志急如星火，通知几位手脚利索的同志分头找去，无论如何要把人找到。

我当然知道肩上的份量。身边的大骡子驮的全是打土豪劣绅缴获来的金银财宝，整整装满两个麻袋，中央机关的一大部分财产，就系于这骡子身上，其价值无法估量。现在人财皆失，泽民怎能不心焦！

到了中午，走进一片小树林，接到通知就地休息。我正在左右为难，看见毛泽民从后面人流中赶到前面来了，远远对着我说：“登榜啊，你可把我找苦了，你怎么跑得这么远，运输队远远在后头呢！”

看到毛泽民，我大喜过望，如同看见救星。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又飞走，一边向他诉起苦来：“这黑天暗地，谁知道这牲口走得这么快，一家伙竟走到省政府的队伍里来了。”

听到我们说话，马明方乐呵呵地过来了：“毛部长哟，我昨晚上俘虏了你们国民经济部的一名小兵和一头大骡子。我们政策是不打不骂，优待俘虏。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好好的。”毛泽民看看马明方，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周围的同志也都乐了。毛泽民走到马明方跟前，两人往地上一坐便聊起来。一会儿，毛泽民笑着向大家挥挥手，带我往回寻找国民经济部的队伍。马明方在后头仍不忘调侃：“我说毛部长，人和物我可是完璧归赵了，下次可不要忘了给我们改善供给啊！”

整整两天的急行军，第三天下午才到达保安县。接到

通知就地宿营时，我们已是人饥马乏。毛泽民又赶紧张罗安顿机关的住宿。

这时，毛主席的警卫员找到我们，通知毛泽民立即参加会议，有重要任务。毛泽民随警卫员到毛泽东、周恩来住地，一直到黄昏落日，点上油灯时才回来。毛泽民带回两项重要任务：1、披星戴月尽早赶到定边县二十九军军部，找到宋时轮、宋任穷同志；2、毛主席指示：尽快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尤其是粮食，要有足够的储备，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到来，为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做好物质上的准备。

到了定边，安排在二十九军军部住下。定边的百姓热情欢迎中央红军到达，家家户户洒扫庭院，为中央红军腾房子，送给养，慰劳战士。国民经济部安顿下来之后，毛泽民开始组织大家补充给养、收购药材、购买咸盐，以准备新的行动。听说我们要购买咸盐，定边地区的商会会长急忙来告诉我们：咸盐用不着购买，从定边往西约80华里处的盐场堡，是产盐之地，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派出牲口走一趟，盐的供应也就足够了。

我承担了运送咸盐的任务。为了防止半路上零星地主反动武装的袭击，毛泽民指示从二十九军军部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运盐，并负责路上的保安工作，以防万一。于是，我带上一个排的兵力，赶着牲口往盐场堡的方向出发。

距定边80多里地的盐场堡，是个著名的产盐区。盐场四周是一大片沙漠，附近人丁稀少，百姓们就在这里以卖

盐为生，天越旱，盐越多，天下雨，盐场便泡在水里了。盐场堡的党组织知道中央机关到这里运输咸盐，立即热情地带我们到盐场，组织当地百姓开采。盐层很厚，很快便堆成小山般的盐垛。身在盐场，处处是盐的结晶体，真让人眼界大开。我们将盐装满大包小包，由骡马驮到定边。毛泽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食盐紧缺的问题，非常高兴，通知向中央机关大量供应，并通知让每位战士尽量多带些盐，准备今后打仗行军途中时用。毛泽民还认为既然盐源这样充足，就得想办法往外运，以此筹集些钱款，或换取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必需品。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是靠盐吃盐，把盐运出去以增加财政收入，以后便成了定边地区的一项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毛泽民还提出了依靠定边当地政府，广泛收购皮毛和药材，尤其是甘草一类的土特产品，运送到国民党统治区里，通过我们的内线从那里换取我方军民生活必需用品的建议。

为了生存，国民经济部就得千方百计，使尽十八般武艺筹粮筹款，创造各种条件，保证党中央和红军的各种经济需要。

（五）

随着中央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经济方面的支出逐步增多，中央国民经济部需要开辟更多的财源；又因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即，更使陕北苏区面临的经济问题格外突

出和急迫。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我曾两次陪同毛泽民到盐池县（今属宁夏自治区）筹集物资、粮款，眼看着红军大会师的日期迫近，物资准备尚觉不足，他忧心如焚，经常带上警卫员下到各县检查工作。由于盐池方向是国民党马鸿逵部政治土匪频繁出没的地方，毛泽民不得不同意二十九军派出战士沿途护卫。第一次去盐池县时毛泽民带上我和警卫员，还有二十九军的战士们。第二次是和高岗的“蒙古骑兵游击队”一道去的。在盐池县，毛泽民侧重了解县里的财政情况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由于路途坎坷，每一趟跑下来，毛泽民无不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有一天，毛泽带着警卫员从盐池的方向过来，中午到达盐场堡。吃完午饭，我向毛泽民汇报了这里的工作。下午时分，毛泽民要我同他一道回定边。我随同毛泽民拉着马，离开盐场堡，一边走一边向他介绍这里的情况。

一出长城，我发觉靠城墙一侧的道上，许多手拿着鞭子、头扎着白毛巾的中年人，赶着许多小毛驴，正晃晃悠悠地在道上走着。稍远处，也有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交头接耳的赶驴人，有的躺在地上抽着烟。在这个时候，道上似乎不应有这么多的赶驴人。我不禁生出疑惑，于是便多长出个心眼，从这些人身边走过时，便悄悄地打量他们。

走得远一些，毛泽民纳闷地问我：“登榜，你看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悄悄地对毛泽民说道：“这些人不象是赶驴的，你看他们细皮嫩肉，有的如同白面书生，不象是种庄

稼人的模样。这年头百姓生活艰难，要下地干活养家糊口，哪个庄稼人不是双手粗糙，面孔黧黑？哪能保养得这样好。”

毛泽民立刻警觉起来，命令我立即返回盐场，通知在盐场的同志，要他们提高警惕，晚上加强岗哨，以防发生意外。我立刻骑马返回了盐场，把毛泽民的命令传达给大家。然后我同毛泽民一道返回定边。在路上，毛泽民赞许地对我说：“你倒发现得快，我还没有这个意识。”

第二天清早，二十九军送来急件，这是宋时轮同志的亲笔信，要我立即到军部。我心急火燎地赶到二十九军军部，宋时轮、宋任穷同志和许多领导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宋时轮同志见我来了，便告诉我：“登榜，昨天夜里马匪偷袭了盐场堡，据目前的情报看，你们盐场堡的摊子已经垮了，死伤非常惨重。我们决定立即派出一个团到盐场，你随团立即出发。”我骑上马，和战士们一路急行军去盐场堡。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二三十名朝夕相处的战友，现在生死如何？出发前毛泽民目送我随部队出发，他也在焦虑地等待来自盐场堡的消息。

袭击盐场堡的匪徒，正是我们昨天下午遇到的那一伙细皮嫩肉的“白面书生”，这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在靖边一带为非做歹的马鸿逵土匪。由于马匪的袭击，我们在盐场堡的同志只有一人生还，其余全部牺牲。我们含着泪水，用草席掩埋了牺牲的烈士，在座座新坟面前我们列队默哀，向烈士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国民经济部的

主要工作是筹措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吃、穿用度以及其它一些后勤保障。正在这时候，接到通知，在定边往南100多公里的一座废弃兵站上，存集着前方战士收缴土豪劣绅的大批金银财宝，要国民经济部立即派人前去运回。

这批财富是这一时期收缴工作中最为可观的一笔。这样一批巨额财富的到来，对于严冬即将来临而尚在饥寒之中的红军战士来说，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喜讯。毛泽民立即集合起一支由100多头毛驴组成的庞大运输队，并从二十九军调借一个骑兵营负责沿途保卫，还命令我负责这次长途运宝。

浩浩荡荡的毛驴运输队出发了，毛泽民叮嘱我，在4天之内一定要赶回来，如果赶不回来，一定要派骑兵送信来。他深知如此庞大的运输队集合出发，必然要惊动在这一带活动的马部土匪，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是避免不了的。因此从我们出发的那时起，毛泽民就一直关注着我们此行的安危成败。

果然不出所料，当运输队出发后，刚走完一半的路途，准备就地宿营的时候，警卫战士就同来偷袭的马部骑兵队发生了遭遇战，战斗立即展开，密集的枪声在村庄的四周响起。敌人的袭击遭到警卫营的顽强抵抗，他们始终没能冲进这座小小村落。交战到半夜，枪声渐渐稀少，马匪偷袭我驮队的阴谋终未得逞。整整一夜，我们百倍警惕，枪不离手，等待东方天亮。

晨光熹微，我们继续赶路。按路途测算，还得再走一

个整天。由于我们防范严密，虽有零星匪徒从旁骚扰，但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那座废弃兵站，同看管这批财宝的红军战士联系上了。

由于行色匆忙，100多头毛驴多数没有鞍子，这给运输带来许多麻烦，装满财宝的麻包不时因路途的坎坷不平而从毛驴背上滚落下来。形势十分紧迫，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在兵站办好物资移交手续后，便装包打捆，便赶着驮队很快又踏上归途。毛驴生性温和，驮着沉甸甸的物资一头接着一头，老老实实地往前走。当运输队穿村过寨，眼看着距定边还有50多里的时候，运输队的后部又遇到国民党骑兵队的袭击，在驮队后面的警卫战士马上同敌人接上火，枪声骤然响起。我则命令运输队更加加快速度。我深知，只要靠近定边的红二十九军军部，这股匪徒便会不打自退。但这队毛驴大概也跑累了，无论怎样吆喝，怎样抽鞭子，它们仍然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当时北风凛冽，气温很低，但我们却因又饥又累，汗水把全身都湿透了。幸亏这群匪徒且战且退，渐渐地在黄土高坡上消失了，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摆脱敌人的纠缠，我们离家也越来越近了。当运输队回到定边，一直在等待我们消息的毛泽民立刻迎了上来，同警卫战士亲切握手。见到我，他拍拍我的肩膀诙谐地对我说：“登榜，放你一天假，记你一次功。”

(六)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很快，中央派人通知毛泽民立即到保安开会。一两天后，我们又接到了毛泽民的通知，要我们国民经济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立即到保安县集结待命。

大约一个星期后，毛泽民要我回延长油矿担任行政矿长兼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交待我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迅速组织力量，恢复油矿生产，解决党中央机关和群众的用油问题。毛泽民对我说：“你是本地人，油矿情况也了解，时间很紧任务很重，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再来找我。”

临走前，毛泽民让我经手把前方交回的一批瘦骨嶙峋的毛驴和骡子卖掉，筹措一些钱作为油矿费用。这些从战场上退下的牲口，有些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我们便很便宜地卖给了当地农民。把这批牲口处理之后，我便收拾行装，来到延长油矿，开始了新的工作。迄今许多人戏称我是“老石油”，起因在此。

延长油矿开发于1900年，是我国最早发现和开采的的老油矿，中国大陆的第一口油井就在这里。这座油矿产量不高，但油质极佳，其质量至今仍为石油界同行所称道。近代以来，列强恣肆，兵荒马乱，使延长油矿生产十分萧条，

仅有的几口油井“苟延残喘”。在陕北苏区被敌重重围困的艰苦岁月，这几口小油井简直是我们的命根子。毛泽民极富远见，一开始便把眼光盯着油矿不放。

到了矿区，我立即根据毛泽民的要求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我在油井附近的窑洞里住下来，每天同工人一起并肩劳动，风餐露宿。油矿生活异常艰苦，生产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充分发挥工人兄弟的积极性，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打井的钢丝绳用完了，工人们用旧的代替；吊油没有吊车，使用手摇辘轳；储油没有油罐，便自砌石板池。在克服种种困难，发挥集体智慧的情况下，一桶桶原油抽出地面。当时发明的空中套井和钢丝打结法，竟一直沿用至今。

毛泽民工作虽然十分繁重，却一直惦念着油田的生产。当第一桶清纯的煤油披红挂彩，由毛驴驮到瓦窑堡国民经济部报捷的时候，毛泽民大松了一口气，他异常兴奋，连连说好，并再三叮嘱我注意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注意团结并依靠他们。那时，我与严爽合作共事，双方以诚相待，关系十分融洽。对技术人员我们在工作上信任支持，生活上给予照顾。虽然也有小股国民党反动武装不时前来骚扰，但由于我们政策对头，措施有力，技术人员中的大多数安心在油矿工作。在工人和技术人员同心协力下，油矿的生产也渐渐走上正轨。当时，矿上加工原油的炼油矿设备十分陈旧，一台炼油的老式锅炉，每星期炼一炉，至多两炉，炼油工人在烟雾腾腾中翻搅，取样。当敌机空袭，警报鸣叫时，我们还得赶快撤离，跑到防空洞里避一避，解除警

报后，再重新炼制。毛泽民曾几度来到油厂，对工人嘘寒问暖，很受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爱戴。不同品种的油料炼制好后，工人们用骡马驮往瓦窑堡的国民经济部贸易局，再由贸易局调配到中央机关和各地的消费合作社。有一段，中央机关点灯用的蓖麻子油非常缺乏，工人们知道后心里很着急。一些老工人想办法从含蜡的柴油中提取白蜡，制作成一根根蜡烛，然后送到中央机关，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使用。后来，油矿制的蜡烛竟成为根据地不可或缺的照明用品，较好地解决了机关和百姓的照明问题。不久，我们收到毛泽民的一封信，他在来信中称赞油矿全体工人干得好，干出了成绩，应该受到表扬。我把来信的内容告诉了大家，工人们十分高兴，生产的劲头更足了。

果然，在中央国民经济部工作会议上，延长油矿的工作受到毛泽民的表彰，毛泽东同志也对延长油矿“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以及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七)

油矿工作走入正轨之后，毛泽民又交给了我一项新的工作——主持印制边区货币。

为繁荣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货币不受国民党金融风潮的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贸易和货币流通能够正常进行，毛泽民下决心报请中央对边区币制实行改革，自制自

印边区钞票，亦称“边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

印制、发行钞票事关重大，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在具体的设计制造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造纸技术不过关。

瓦窑堡东边 20 里处有一间小型造纸坊，里面仅有一名技术工人。这家作坊的造纸技术，只能生产一般的书写用纸。这种纸张易撕易折，经不起浸泡，年头一久便发黄变脆，不能做为钞票纸张。而制造钞票纸张的原料成分和搭配比例是多少，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毛泽民对此事很犯愁。一天晚上，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大雪，毛泽民睡不着，披着衣服从隔壁窑洞走到我的窑洞前，敲敲门说：“登榜，还没睡吧，起来聊聊吧。”开门请他进来，点亮小油灯，我们盘腿坐在炕上，拥着打满补丁的棉被，谈起工作来。印币的纸张如何解决？从外地运进来，要冒很大风险，也不现实。思来想去，只能对现有的造纸坊进行印制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改造，以拿出合乎印币要求和规格的纸型来。谈到这里毛泽民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无论如何要把纸样拿出来。”当他离开我的窑洞回去后，我关上门，整个晚上未能合上眼，为解决印币纸张问题苦苦思索。

实践出真知，边干边学习。纸张不行，先用布匹代用。我们找来五幅洋布，在河里刷洗后上浆，晒干后裁成一定规格的块块，作为印刷钞票的材料。这就是边区最早的“布票”。“布票”的发行曾轰动一时。但洋布来之不易，成本也太高，因此“布票”不可能大批量地投放市场，还必

须用纸张来解决。我们又回到造纸坊，开始用不同的配方案试制钞票用纸，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制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纸样，烘干后经过比较。最后终于选出了较为理想的纸型。经毛泽民和其他有关领导的测试，基本可用。纸型确定后我们便开始批量生产。毛泽民同财政部长林伯渠、银行行长曹菊如几经研究，委托莫亚光同志（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负责设计出面值大小不等的钞票图样，审查通过后制成模版，再投入正式印制，便正式印出了革命根据地内通行的钞票。以后，这家造纸坊不断发展扩大，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党中央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时，这家造纸坊已发展为造纸厂，又为《解放日报》的印刷提供了足够的纸源。

（八）

1936年过去了，辞旧迎新，人心振奋。经过战火的考验，陕甘宁边区革命形势日益好转，工农武装力量不断壮大。1937年春天，毛泽民受中央委派，到上海购买印刷机器，秘密运回延安，准备在延安首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①。

上海是毛泽民多年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这一年春天，

^① 《解放》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初为周刊，后改半月刊。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办后，该刊停办。

毛泽民换上一套东北军衣服，同章汉夫等同志专程前往上海，临行时我受上级委派到西安火车站为他送行。我深知他这次前往上海，处处有艰险，尤其是运送印刷机械，稍有差错，就有杀头坐牢的危险。但临行前毛泽民谈笑自若，分手前还不忘叮嘱经济部里的工作。

毛泽民这一走约两个多月。在去上海的路上，他历尽艰险；到上海后，又千方百计通过我地下党的关系，联系购买印刷机械，然后通过东北军的关系，由祝志诚同志负责将印刷机械运往驻西安的东北军所在地，再由东北军收转运往延安。毛泽民认为，光有印刷机器，没有技术工人也不行，为此，他通过地下党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印刷厂，经过多方做工作，动员了该印刷厂约 2/3 的技术工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批同志到延安之后，毛泽民立即组织安顿好他们，然后同他们一道挑选厂址，安装机器，很快创办起《解放》周刊社的印刷厂。

记得毛泽民回延安后曾托人到延安油矿，让我回延安来见个面。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别，毛泽民比去的时候明显胖些，皮肤也白一些。毛泽民打趣地说：那里没有太阳可晒，自然要白一些喽。他一边拿出从上海买来的一件背心、一支铅笔送给我，一边关切地询问我家的情况，询问油矿的工作。并说：“通知你来，想请你吃顿饭。”我一听，高兴地说：“好哇，老部长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小兵呀！”中午，他请我们几位同志在延安边区合作社里吃了顿羊肉荞面和烙大饼。

随着印刷厂的创建，《解放》周刊在延安首印成功。《解放》周刊传播革命道理，团结劳苦大众，令敌人闻风丧胆，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博古同志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当他和夫人来看毛泽民时，连连称赞：“你的功劳很大很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印刷厂，自己的工人，自己的报纸！”

毛泽民这一回在延安居住的时间不长，便轻装简从，外出执行新的任务，一直到1938年春，他才返回延安。

这次见到毛泽民，是在延安贸易局靠山一间仓库旁边的窑洞里，毛泽民一见面便笑咪咪地说：“登榜，你这土包子要不要出去见见世面，开开洋荤？”见到毛泽民，我当时心里很是高兴，当听说他住些时候又准备走时，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毛泽民说：这次是专门去苏联治病的，也算是第一次到国外，病治好后就返回。

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年月，毛泽民同志为党为人民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他鞠躬尽瘁，尽职尽责，终因积劳成疾，得下了严重的哮喘病和胃病。尽管病魔缠身，但他从不叫苦，从不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妨碍工作。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病。面对组织的决定，毛泽民同志只得服从，遂于这一年的2月21日离开延安，踏上出国之途。本来，他是预定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转道前往苏联的。不想，因中苏边境道路发生暂时中断，他在迪化作短期停留时，被当时伪装进步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留在新疆帮助整理新疆财政（当时，为维持新疆作为陕甘宁

边区与苏联联系的通道，我党一度十分重视对盛世才的工作)。此后，我也被他要到新疆参加那里的工作。1942年秋盛世才撕下“进步”假面具，对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施加反革命迫害，我在新疆系狱，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同志于1943年9月27日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毛泽民同志虽然牺牲了，然而，他那种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以及千方百计发挥创造性、主动性完成革命任务的精神和风格，却永远为后人所缅怀，并永远鼓舞我们这些后继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向前。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 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汪 东 兴

(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的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一路上，毛

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1970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谁知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①。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

^① 1968年9月，《人民日报》为纪念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给日本工人的题词，发表了《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的社论。毛泽东删去了社论草稿中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等文字。1969年，毛泽东删去了九大《政治报告》初稿和提交九大通过的《党章》初稿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等文字。1970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的初稿时，删去了“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等文字。

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接着又问我：“你的意见是……”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

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即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一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啊？鲁国小，人少，只是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把齐国打败了。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的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报告了于新野。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

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一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它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北线预谋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

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5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当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时，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到上海安排好后，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南京部队司令员许世友来上海谈话。我们就打电话找许世友，不巧，许世友下乡去了。

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谢绝了。

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在搞分裂，不搞团结。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然而毛主席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我们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就被我送下了车。

我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

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问：“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时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到南京，在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我跟他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有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12日13点10分，专列在丰台停车。毛主席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在谈话中，毛主席谈了党史上历次路线斗争，谈了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庐山会议后采取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做法，谈了华北批陈整风汇报会及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检讨。继续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下午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了。到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

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我回答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为了转移，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256号

三叉戟，是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 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此外，他们还打算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传达给王飞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据后来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林立果还对于新野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 9 月 13 日早上有一架伊你—18 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林立果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 30 支手枪，2 支冲锋枪，并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策划布置下去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

12 日晚 8 点钟左右，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王飞、于新野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于新野

负责组织人员，保护林彪一伙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证明：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的。

(二)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小楼，这就是当时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在这里正忙着调兵遣将。可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到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

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到这里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 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 9 点 20 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还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当时都守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时，张宏又来电话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要我别离

开电话机。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随后打电话把正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张宏去查一查，山海关机场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并要求我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我从张宏那里很快就得到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我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

晚上 11 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时骗周总理说她不知道。

稍微停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中南海南楼，都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也说：“越快越好。”

这样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就忙开了，但是他们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立刻被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向大队部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

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冲过岗哨时，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看到这些，坐车追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地上。飞机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领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等强行登上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 30 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我们向毛主席作汇后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 9 月 13 日凌晨，1 点 12 分。机彪专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 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中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那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

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林彪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

9月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是陈修文。这个同志很好，后来被迫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便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陈修文这时开始往回飞，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

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只能感觉航向有变化，而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在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陈士印，将陈修文身上流出来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飞机上装死，否则他也被害了。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跑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了。这两个被撕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就听“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具尸体。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当时，李伟信还喊：我要找卫戍司令。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

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到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随后，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

我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

我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

和经办的外交官已都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降落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情况。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待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他们在拚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对我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

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等人宣布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的。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们终于将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历史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毛主席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以他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成功地识破、挫败了林彪集团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宗派活动。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年南巡期间，毛主席又以其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成功地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暗杀、分裂等一系列阴谋，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与分裂活动的殊死搏斗中，夺取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分裂，中国的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

李锡九传略

刘金田 李月兰

李锡九，本名李永声，字立三，后得知与湖南李立三同名，遂登报声明：“河北立三，易名‘锡九’”。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锡九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家庄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洛贺，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后来李锡九变卖家产、从事革命活动，他都予以支持。李锡九在兄弟5人中，排行第五。他自幼聪明，博学能文，长成后中过秀才，做过廪生。后又于1904年毕业于直隶农务学堂（今河北大学的前身）。

李锡九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李锡九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横暴，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于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斗争。

1905年李锡九考取公费留学日本。最初在经纬学校警察科学习警政，后来在东京自强学校应用化学科攻读理化。同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李锡九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逐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他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

1907年，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由日本政府出面颁布了一个取缔中国留学生反清活动的规则。在同盟会

的领导下，留日学生积极开展斗争，抗议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举措。李锡九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于最后因抗议无效愤而回国，在保定担任直隶警务学堂学监。此后，他利用这一身分，积极传播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同时多方联络，着手组织保定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同盟会会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锡九和同盟会北方组织的一些同志，积极奔走声援。中华民国成立后，李锡九当选为直隶省议员，1913年4月又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这时袁世凯认为国会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障碍，于是，他开始向国会开刀，千方百计地踢开国会。作为国会众议员的李锡九，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作了坚决的斗争。直到1914年国会被袁世凯解散，他才又回到保定，继续执教于直隶警务学堂。

1917年7月，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乘“海琛”号军舰自沪南下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李锡九率先响应南下护法，于这年8月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于黄埔公园设宴招待南下的国会议员，讨论召开国会问题，由于不足法定人数，遂改为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李锡九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非常国会议员。

1919年五四运动后，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1920年1月，天津反动当局先后逮捕了马千里、马骏、周

恩来、于方舟等爱国学生 20 余人。李锡九、江浩等人积极参加了营救爱国学生的活动。1922 年国会第三次在北京复会时，李锡九又来到北京。

这一年对李锡九的一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在北京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自此，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深刻变化，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在这一年，经李大钊介绍，李锡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此后李锡九便一直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分为党开展工作。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的人也为数不多。直到 1979 年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他的中共党员的身分才被公开。

1923 年 6 月 13 日，直系军阀曹锟逼走大总统黎元洪，制造了“第一次北京政变”。政变发生后，参众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均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曹锟为了急于当选总统，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等手段。对此，李锡九坚决予以抵制，并与王葆真等人在《晨报》公开刊登启事，声明拒绝参加贿选。自 6 月 15 日起，一些国会议员纷纷离京，准备异地开会。李锡九是最早离京的议员之一。6 月 20 日，他与一些议员联名发表了离京宣言。同时，李锡九还参与联名致书国会两院同人，充分揭露了曹锟和“猪仔议员”的丑恶行径。一时间，国会议员离京人数猛增，

^① 见河北安平县委档案科存卷。

至6月28日已达295人，还有一些议员也陆续准备离京。7月10日，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发表告别北京宣言。7月12日，离京国会议员再次发表宣言，声明“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南下上海继续开会，自6月14日起，北京政府一切行为视为无效。”9月8日，离京国会议员483人又联名通电，声明不承认离京期间在北京的国会作出之“一切议决”。李锡九又列名这次通电议员之中，并继续以拒绝返京的行动抵制了直系军阀曹锟于这年10月10日举行的贿选活动。

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就各地党组织如何帮助国民党改组作了具体部署，还要求各省至少有1名中共党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3人作为直隶省和天津的代表前往上海。由于李锡九是中共秘密党员，所以，他是以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代表的公开身分南下参加国民党“一大”的。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贯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肯定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国共两党合作形式，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决议案。会议期间，当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为会议制造障碍。李锡九坚决地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大会上

慷慨陈词，驳斥了冯自由等人的反共言论。他的发言深为当时参加大会的毛泽东所赞赏。当他发言结束回到座位后，毛泽东走到他的位子前看了看他座位上的名字，并于当天晚上登门拜访他，与他进行了长谈^①。

会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等人回天津负责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和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展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是与开展国民运动、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进行的。1924年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要求，天津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李锡九、江浩、于方舟等人在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改为正式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内设党务、组织、宣传、青年、农工、妇女等部，李锡九任组织部长，邓颖超任妇女部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和邓颖超认识并且一道开展革命工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以至后来邓颖超还时常谈及他们共同工作的这段经历。

当时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均设在以“李允中”名义租赁的英租界义庆里40号住宅。李锡九就住在这里。这里同时也作为国共两党在天津与各方面联系工作的交通站。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

^① 据张述孔的回忆，原件存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言”。中共天津党组织和李锡九、于方舟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力筹备组织各项活动。4月27日，李锡九代表中共天津党组织出席了天津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天津团地委协助中共天津党组织全力筹备各个纪念日的工作。随后，中共天津党组织又召集天津市学联负责人会议，讨论并布置工作。5月1日，天津党团组织发动各界举行游行示威，以纪念五一节和在京汉铁路罢工中被枪杀的施洋烈士。5月4日，天津市学联主持召开有700人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天津市党团组织特邀中共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到会演讲。5月5日，天津市党团组织举行报告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蔡和森再次应邀到会发表演说。5月7日，在天津党团组织的发动下，天津“五七”国耻纪念会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并于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这时的李锡九已经50多岁了，但仍积极奔走，不辞辛劳，奔波于天津、河北各地，开展革命工作。

稍后，李锡九到保定，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建立了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共产党员张延瑞、张秉均、刘曾宪为执行委员。随后，李锡九又到河北安平、饶阳一带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这个时期，他在家乡创办的“两校”影响也很大。他变卖了家乡田产，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创办起农民夜校和女校，并让自己的女儿李之光带头进入女校学习，使女校

学生人数一时高达三四十人。后来，这个女校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他还让自己家的长工带头参加农民夜校，其他农民见状也纷纷入校学习，使在校学生数高峰时达四五十人。对生活困难的农民他还特别给予学习补助。学习内容则除识字外，间或讲一些革命道理。教员由本村有知识的青年担任，李锡九自己也曾亲自到校讲过课，并在学生中发展过党员。后来他在外工作期间，还常给家乡的党支部和家中写信，询问办学情况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嘱托“可用我家的粮食救济贫民，可变卖我家土地，资助两校费用，无论如何要把两校办好。”他亲手创办的“两校”曾为革命输送过不少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李锡九还在安平、饶阳一带从事建立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仅他亲自发展的中共党员就有饶阳的韩子木、安平的李少楼、李子逊等人。后来，饶阳、安平两县的中共县委便是由韩子木、李少楼以及弓仲韬等人组建的。

1924年7月，在中共北京区委成员赵世炎的主持下，天津全体中共党员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当时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军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扣押了曹锟，驱逐清帝出宫，促使了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

败。但人所不知的是，冯玉祥的这一惊人举动是和李锡九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李锡九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当时在北方是有一定声望的。他和冯玉祥的关系比较好，曾帮助冯玉祥分析形势，极力说服和鼓励冯玉祥脱离直系军阀势力。同时他还对与冯玉祥关系至为密切的胡景翼和孙岳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对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改变态度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于是，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和通电等，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于天津是孙中山北上的必经之地，李锡九便全力投入了组织天津各界人民欢迎孙中山北上，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等活动。11月25日，李锡九、安幸生和职工运动负责人李培良、卢绍亭以及天津团地委负责人崔物齐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门前，将一摞摞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传单、旗帜搬上黄包车，随即分发全市，使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为各界广为了解。12月4日，孙中山乘船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李锡九和于方舟、江浩、马骏等人上船迎接孙中山，孙中山紧紧握着江浩、李锡九的手说：“兄弟为谋救国之策曾两次来天津，这次抱病北来，不是争权力的，而是为了消弭内战，主张南北议和，促成国

民会议，废除各列强不平等条约。”随后，在李锡九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宋庆龄下船登上专车前往日租界张园下榻。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胡景翼邀李锡九到河南任职。李锡九随即担任了胡景翼的高等顾问兼河南货捐局局长。利用这一职务，他为党作了大量工作。例如，李大钊要李锡九每月拨400元作为党组织的办公经费，区委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发8块钱生活费，不足者由北方区委补贴，李锡九每月照数批拨。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后，李锡九辞职回到天津。

1925年2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调整了领导成员，增补了两名候补委员，于方舟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李逸任组织部长，卢绍亭任农工部长。还增设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和农工委员会，李锡九和江浩分工负责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同年6月，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对天津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区委又派李季达来天津，改组天津地委。原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改为国民运动委员会，仍由李锡九、江浩负责。从这时起，李锡九的精力全部倾注于直隶和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区委发动了“反奉倒段”的革命运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逼近天津，准备进攻驻守天津的奉系李景林部。为配合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在国民军第二军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刘格平受中共河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天津，和中共

天津地委取得联系，准备组织天津工人暴动。刘格平到天津后，和李锡九接触最多，他的不少活动都是李锡九亲自安排的。其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袁子贞和刘格平反复研究暴动计划，并在豪福洋行购买了枪支、弹药，经多方努力，建立了300余人的天津工人别动队，秘密进行军事训练。1925年12月23日，国民军向奉系天津守军发起总攻时，天津工人别动队从东南城角冲击，迅速占领了军警督察处，配合国民军击溃了奉系李景林部。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第三军军长孙岳任直隶督办兼省长。李锡九和孙岳私交很深。他通过孙岳把在五卅运动中被捕的共产党人营救出狱。这时天津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店员等各界群众组织不仅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得以公开活动。李锡九还被孙岳委任为直隶纸烟捐务处处长，借此机会，李锡九安排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内工作，使这些党员既维持了生活，又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在此任上李锡九还积极整顿积弊，树立新风，对内安定民生，对外则不畏洋商力争利权，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作了尽可能多的贡献。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商讨如何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史称“西山会议”。李锡九、江浩以及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左派，坚决抵制了西山会议。

1926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天

津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通告要求，召开纪念会，并以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党部的名义，在南市大舞台举行为期5天的纪念活动。期间，在李锡九、江浩、于方舟等人主持下，在南市大舞台召开了近万人的纪念大会，由李锡九等人发表讲话，追念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丰功伟绩。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李大钊也亲临天津，作了题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说。天津的党团组织还散发了《孙中山纪念册》、《向导》、《中国青年》、《工人生活》等宣传品30万份，使天津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掀起了一次高潮。

1926年3月22日，国民军第三军撤出天津，李锡九在国民军撤离天津后南下广州。

李锡九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一起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未设院长）。但他仍秘密参加中共支部的活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山大学相距不远，所以李锡九和林伯渠都参加中山大学的中共支部过组织生活^①。

1926年12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革命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这种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并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正式办公。但在这时，蒋介石为

^① 据徐彬如1980年1月的回忆材料。

把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却提出迁都南昌，并且蛮横扣留了由粤迁汉途经南昌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操纵召开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南昌，并把这一决定通知武汉方面。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反对下，蒋介石把持国民党中央分裂国民党的图谋一时未能得逞。2月2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李锡九出任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兼军事裁判所所长。由于他在这场“迁都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一边，因而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忌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锡九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共行径。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就在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徐谦以李锡九为共产党员之名下令逮捕了李锡九，关押于武汉军警督察处。后因证据不足，加之国民党内一些老朋友的营救，李锡九获得了释放。

此后，他由汉口转道上海回到北京，在右安门内躬亲耕作，种菜务农藉以掩人耳目。期间，汪精卫曾邀他担任监察院委员，居正也邀他担任司法院委员，他都予以婉拒，并曾联合10余人，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宣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因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派别的反蒋活动，所以有人称他有“反蒋癖”。

1929年李锡九到上海，参与反蒋活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李锡九又参加了反蒋联盟。他

积极奔走于各反蒋实力派之间，多方联络倒蒋。因他一度与汪精卫有私谊，故还曾专门赴香港迎接汪精卫来北平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随着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告结束，扩大会议也随之流产。李锡九再返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锡九一度南下香港、广州，以图联合粤桂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但因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李锡九愤而北返。

1932年春，冯玉祥避居泰山读书期间，李锡九曾应冯之邀请前往泰山。当时冯玉祥在泰山还曾邀请了一些知名教授，李锡九和这些教授们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思想上有不少共鸣，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时期，李锡九不仅积极反蒋，而且积极为抗日奔走。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承德后随即派兵进抵长城各口。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抗战。军阀孙殿英部也参加了长城抗战。就在孙殿英率部参加长城抗战、移住沙城一带时，孙殿英先后几次派人到北平，聘请李锡九担任他的高级顾问。李锡九来到孙部后，积极帮助策划该部的抗日事宜。他还通过孙殿英向北平何应钦保释了关押在北平监狱的共产党员韩麟符。韩麟符出狱后，即被李锡九介绍到孙殿英部担任政训处处长。李锡九还介绍了共产党员宣侠父、孙金萱、王仲青等人到孙部任职。我党亦通过李锡九向孙部派去了不

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5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抗日同盟军，对孙殿英采取了又拉又压的两面手法，要孙殿英率部进攻张家口攻打抗日同盟军。李锡九闻讯后坚决劝阻孙殿英不要打抗日同盟军。经过李锡九的工作，孙殿英表示决不向抗日同盟军开一枪，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随之，蒋介石又命令孙殿英让出沙城一线。又是李锡九出谋，孙殿英以无处可去为词，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李锡九在孙殿英部的成功工作，大大地缓解了对抗日同盟军的压迫。

此后，李锡九还曾在冯治安（仰之）部活动过一段时间。冯治安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李锡九曾主持办理过向内蒙五原地区移民，建立“仰之新村”的工作，借以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再度举行游行示威，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这段时期李锡九颇为忙碌，他在北平的家中常常是宾客盈门，一些进步教授和学联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些人时常出入他家，共同谋划有关学运的一些重要活动。

1936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天津，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1937年2月，刘少奇率北方局领导机关移住北平。初到北平时，刘少奇住在西四砖塔胡同四眼井10号林枫家里。半个月后，刘少奇搬到鲍家街后面的寿逾百胡同17号居住，担当铺保的就是李锡九。当时负责北方局情报工作的王世英夫妇也以李锡九的家作为北方局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地点，对外以与他有亲戚关系为掩护。

西安事变发生时，李锡九正在北平。他接受并拥护党的逼蒋抗日的指示，积极奔走于有关方面进行工作。不久，即毅然决定不顾年迈和路途艰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锡九到达延安。延安是李锡九内心一直向往的地方。身临延安，耳闻目睹的一切，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也会见了，同他叙旧并同他几次长谈。后来李锡九又把女儿李之光送到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保育院工作，成为延安保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李锡九致力于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实行及为民族抗战多方奔走的革命活动，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对于真正的三民主义纲领，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早已执行。“并且十年来真正的三民主义传统也仅仅在于共产党一方面，国民党除若干分子如宋庆龄、何香凝、李锡九等人而外，抛弃了这个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锡九奉中共中央指示，再赴河北

孙殿英部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李锡九到孙部后被委任顾问。当孙部一部分于1938年渡过黄河到豫西时，我们党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将会向河南大举进犯，决定在豫西开辟敌后战场。李锡九奉党的指示在豫西利用孙殿英的名义，召集了几百学生筹办了豫西教导大队，为当地以后在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准备工作。其后，李锡九还担任过国民党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的顾问，并曾一度被委任为河北省政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李锡九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利用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一直在华北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中进行统战工作，从事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他曾参与策动高树勋的起义，也曾在北平通过耿毅做国民党华北补给区司令耿右麟的工作，使其将一批军用物资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李锡九又作为傅作义将军的秘密使者，赴西柏坡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和平解放事宜。

1948年冬，李锡九、耿寿伯等致电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并转毛泽东：“锡九等于鱼晚抵易县厂城德顺长，有要务极待商决，请派负责人速来，并准备北上处理一切。时机稍延即逝，如何盼覆。”12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致电华北局薄一波、聂荣臻、董必武：“转来李锡九、耿寿伯致主席鱼电悉。望速派汽车接他们至华北政府招待所住下，即以其所谈电告。”经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统战工作，也通过李锡九等在党的指示下对傅作义的有力争取，双

方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李锡九作出了历史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又派李锡九去长沙做程潜的工作，向程潜传达中共中央要他“按兵不动，大军过江以后再起义”的要求，李锡九亦未辱使命。

1949年1月22日，各界人士55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李锡九亦列名其中，尔后他又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他以正式代表身分出席，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同年底，在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他还先后负责民革北京市分部和河北省分部的筹备工作，后又担任北京市分部主任委员和河北省分部的召集人。

新中国的建立，使李锡九精神至为振奋。这时他已年近80，但思想仍十分活跃，为革命工作奔走效力热情不减当年。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期间，积极为新中国献计献策。周恩来曾盛赞他是“老成谋国”。也诚如他自己所说：“从自己一生经历中，深切体验到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也是屡遭挫败。现在中国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强大的国家，人民做了主人。……我虽然老了，但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跟着大家一齐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锡九对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他积极主张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后，他坚决拥护，并对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充满信心。

李锡九在河北省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疾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在河北省政府召开的一次讨论全省预算的会议上，有人主张“河北省收入增多，应向中央多要些钱，多作些工作。”对这一主张李锡九当即发言说：“如果收入多就要多花钱，那么中央拿什么来建设国防呢？”“中国叫国民党反动派弄得乱七八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好不容易统一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央方针政策，才能建国。”他还始终关注着人民的生活疾苦，并不顾年事已高，担任省救灾委员会主任。凡是有关防灾、救灾、兴修水利等工作，无论大小会议或座谈会，他都要去参加。他特别关心有关群众福利的各项设施建设，即使在病中，也不断询问省内有关灾情情况。就在他病故前一周还致信当时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关心省内发生的春疫和防病工作。

李锡九一生生活俭朴。在衣食方面，他向来是只求温饱，反对奢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高、职务高，但从不特殊，而且总是谢绝各种特殊照顾，并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勤俭节约，廉洁奉公。

1951年6月，李锡九因患食道癌住院治疗，1952年3月1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80岁。

李锡九一生，经历了反对清朝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等几个历史阶段。正如李济深在他的追悼会上讲话时所称赞他的——在这 80 年的历史中，在几个历史转折点上，他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走，这正是他既能“择善”又能“固执”的难能可贵之处。

1979 年邓颖超在核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送审的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文稿时，曾讲：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但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永声（李锡九原名）。邓颖超还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北方是于树德、李永声、于方舟等，国民党顺直省党部成立得比较早，李永声的工作很活跃，他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一直以秘密党员的身分从事工作。应该尊重历史史实，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贡献的历史人物^①。

为革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历史贡献的人，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邓颖超就李锡九的革命贡献所作的谈话，正是党和人民对他作出的高度评价。

^① 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第 3 至 4 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

陈 志 凌

(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

“文革”开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繁杂事务牵扯了大量的精力，遂提议并经中央同意，让李富春协助他主管国家经济建设。当时李富春虽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但根据中央的决定，他已经一年多不主管国家计委工作了。当周恩来向他传达中央新的决定时，李富春表示：“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形势，全党注意力重心的转移，恐难把经济建设工作抓好。对此，周恩来说：你熟悉情况，有经验，会针对面临的困难问题提出一些好办法把经济建设促上去的。你的任务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督促、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处

理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困难一定不少，但这是党给你的光荣使命！李富春听了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谈话，感到责无旁贷，坚决地服从了。

7月14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由余秋里汇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7年度计划的初步设想。经讨论，各部门负责人表示基本同意。李富春在对这两个计划提出补充意见的同时，强调各部门不要放松今年生产计划任务的落实和完成，要注意督促检查。

7月中旬，李富春呈报并建议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文化革命运动”以来上海市工业生产中出现了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某些产品产量下降、生产技术协作中断、基建完不成计划、干部放松生产和业务工作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4项改进措施。李富春认为上海工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他们提出的措施也适合于全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向中央提出批转上海报告的建议的。7月19日，中央将上述报告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9月，李富春抓了两件大事：（一）根据生产建设上的混乱情况，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这一《通知》要求：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单位，积

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二)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问题，规定了10项政策，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小商小贩，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集体所有制的手工合作组织，目前一般不改变”；“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等。上述两个文件对保证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11月17日至12月23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交会议。会议首先集中讨论了当前工业生产情况和几个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运输紧张；设备维修差；机械工业产品大量减少；企业劳动力不足。会议期间，李富春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召开了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等省、市，以及铁道、水电、化工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交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代表们提出：为防止社会生产继续遭破坏，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亟需制定并发布一个适应工交企业特点的规定。李富春将座谈会上反映的问题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指出：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搞，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他还根据工交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由他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苏静、粟裕和余秋里等同志组成，

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并抓工交企业的生产。周恩来还要求业务组在李富春主持下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革命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草稿原为15条，后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改成《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于12月9日以中央名义公布。

在周恩来、李富春和李先念等同志领导下，在工交、农林、财贸各条战线广大职工的努力下，1966年的经济工作还能基本上维持正常运转并有一定的发展。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88亿元；财政收入558.7亿元，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

（二）

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全国各地出现的重大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1967年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李富春因为协助周恩来抓生产和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经常要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当然也了解到陈伯达、江青之流煽动群众破坏生产方面的情况。会上，在叶剑英、徐向前指斥陈伯达反军乱军的倒行逆施之后，康生突然对李富春恶语相加，诬蔑李富春联络几位副总理反对中央文革，搞

地下串连，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李富春说：找一些领导同志商量工作，是我的工作职责。如果我不找，对总理的压力更大，社会上生产将会更糟。你们信不过，就请组织专案审查吧！接着，聂荣臻也气愤地指斥江青之流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把他们关押起来，进行打击迫害。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会议无结论，不欢而散。

2月16日，周恩来再次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李富春还做了重点发言的准备，并为此带了一大包因红卫兵冲击工厂、矿山，破坏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材料，准备提请会议讨论处理。但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即向张春桥提出保陈丕显出来工作的问题。张春桥托辞要同群众商量，予以拒绝。对此，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说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他站起来一面向门外走一面对江青等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这时，周恩来叫住谭震林。陈毅也一面挽留谭震林，一面大义凛然地说：“不走”，“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李先念纷纷发言，痛斥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周恩来指责康生在《红旗》第13期社论中号召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错误的，并质问他们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政治局成员商量。这一天的碰头会，文革小组被揭露得狼狈不堪。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

力到人民大会堂，按其所需地“集体整理和核对”出碰头会的“纪录”。然后，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带着整理出来的纪录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2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陈毅、李富春、谭震林等人在碰头会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以为掌握了“尚方宝剑”，开始向老师们发起进攻。从25日起，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局政治生活会。会上，陈伯达、康生等人攻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老师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李富春、李先念等人主张保护老干部“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特务”。他们还把“碰头会”上纲为“一次政变预演”。3月18日，实为批斗会的所谓“政治生活会”结束。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同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林彪讲话稿后，写信给林彪：“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毛泽东的信作为批示传出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革”错误实践的抵制被诬为“二月逆流”，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也随之进入高潮。

(三)

李富春在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行为及对自己的诬陷作斗争的同时，仍然尽心尽力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家工业生产建设。1967年上半年，全国党政机关瘫痪，武斗及打、砸、抢成风，生产秩序更加混乱不堪。李富春和国务院业务组针对上述情况，从3月至6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维护铁路交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等通知。这些通知的下发，浸透了李富春苦心孤诣维护国家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心血。

6月26日，李富春出席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生产供应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工业总产值1到5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7%。但从4月下旬以来，由于许多地方少数坏人挑起武斗、冲击铁路枢纽、破坏生产和运输，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没有完成计划，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他强调，当前要集中力量狠抓农业、煤炭和铁路运输，对急需的农业机械、中小农具和化肥、农药的生产要尽可能注意安排。他宣布中央决定对煤炭部直属的68个矿务局实行军管。要力争在完成下半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再增产500万吨煤炭。

10月24日，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业务组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今年大部分省区农业都增产，各种农作物全面丰收。但是，从5月份起，许多地方由于武斗，工业生产

和铁路运输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到9月份，钢和铁的平均日产量下降26%左右；原煤日产量平均下降到268000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50%；日发电量也下降到15700万度，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60%；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下降到19100车，仅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他指出，当前，要认真解决干部和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继续狠抓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搞好第四季度的煤炭分配。

12月11日，李富春召集国务院工交办事组、铁道部、煤炭部军管会负责人会议，就煤炭生产、分配和铁路运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谈分配，必须首先抓生产，脱离生产谈分配，不是积极的办法。目前，煤炭生产比11月中、下旬有好转，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继续好转。他建议煤炭部派干部下去，对煤炭流向作些调查研究，解剖一只“麻雀”帮助解决问题，促进煤炭生产。

1968年春，李富春不顾陈伯达、康生、江青的反对，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大量工交战线的问題，参加并主持了若干重要的业务会议，审批签发了大批的报告、通知和计划。在动乱环境下，他仍坚持每天上班，每周三、四、五晚上加班。一切业务上的问题，除了极重要的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外，其它都主动承担起来，好让周总理有时间考虑事关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

1968年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驻京部队师、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林彪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

碧的“罪行”，说他们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不准在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其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都坐在主席台上。这几乎是告诉人们，台下坐的人有问题，是可以冲击和打倒的对象。会后，社会上立刻掀起一股打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黑风。

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措辞尖刻地对“二月逆流”进行了所谓“批判”。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林彪、“四人帮”更编造谎言别有用心地说：“二月逆流”这个“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已被打倒外，其余的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李富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境更为困难。中央文革特别派人来到李富春家中，要求李富春不得再过问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不准再同各工交财贸部委领导接触，不得参予各部委召开的生产工作会议，外出须经批准。李富春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一切工作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

的简报上指示：“对所有‘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送林、周。”林彪指示：“要他们好好休息，不要制造新的障碍。”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到李富春家，传达了上述批示。但是上述批示只在李富春所在支部范围内作了传达，对全党和社会上仍旧封锁。此后，林彪“四人帮”之流对老同志的“批判”也照旧进行。更令人气愤的是毛泽东的批示是给林、周两人的，但他们对周恩来进行了封锁，一直到林彪问题暴露后，周恩来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在此，也充分证明了林彪“四人帮”之流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端仇视和他们整人的险恶用心。

(四)

1969年10月18日，林彪“第一号令”下达后，李富春很快被告知要求在20日前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从化。同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无理规定李富春到广东后，不准回北京，不能同其他老同志接触，不得离开所在的城市。

李富春、蔡畅到达广东后，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组织秘书、警卫人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由他们夫妇二人轮流给秘书警卫员作辅导。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不理解，但对毛泽东思想却坚信不疑，而当他们带着“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力图从《毛泽东选集》上找到答案时，却发现毛泽东在书上讲的和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党实行的并不一致。1971年初，李富春获准回到北京，继续接受“批判”，有时一天竟参加两次批判会，他的身体都被整垮了。一天他气愤地告诉秘书，今后任何批判会都不参加，我有病，请假。陈伯达、林彪问题相继暴露后，他曾寄予一线希望，但很快就认识到江青与林彪是一路货色，江青一伙执行的还是林彪那一套，换汤不换药。李富春目睹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十分痛心！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时通宵不能入睡，情绪坏到了极点。

1974年初，当李富春得悉邓小平要出来工作时，他一扫恶劣的情绪，非常高兴地对去看他的人说：邓小平同志快出来工作了，参加政治局。小平同志在党内军内威望高，经验丰富，又有魄力。他出来工作就好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这是全国人民的福音啊！李富春的这番话反映了全党全国多数人的愿望。

这一年的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结束回国时，途经法国，重访了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居住、工作过的地方，还购买了一些当年吃过的黑面包，带回国分给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曾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李富春接到这份礼物后心情很激动，他端详了半天这块黑面包后说：好，好礼物。那天，李富春、蔡畅都吃了黑面包，还分了一些给他们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并给他们讲了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的

经历和克勤克俭、战胜困难的事迹。

从 1974 年春开始，李富春开始咳嗽，时常大口大口地吐痰，发低烧。经检查，发现肺有癌灶。半年后检查又发现心脏肿大。李富春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因此体质十分虚弱。从发病开始治疗，到病情日渐恶化，中间只有 1 年的时间。1975 年 1 月 9 日，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世长辞。在他病危的最后时刻，他同夫人蔡畅商定，将两人工资节余下来的存款全部上交党组织，做为她最后一次的党费。李富春去世后不久，蔡畅很快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将长期节省下来的 10 万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党组织，实现了李富春的最后遗愿。

广东共产党人在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周 兴 樑

本世纪 20 年代初，广东是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基地，也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实现首次国共合作的地方。

国民党改组的完成，是首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前提。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广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党及党领导下的团组织的领导人和一般成员，不仅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国共合作总方针的制定，而且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对推动与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

在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开始考虑国民党改组之时，中共广东区党团的负责人积极参加了决策国共合作问题的党内讨论，其后，又努力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协助苏俄顾问鲍罗庭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为推动国民党进行改组作出了贡献。

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分别成立于1921年秋和1922年春，当时正是孙中山在广州进行第二次护法和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达林的建议开始酝酿国民党改组的时期。为了研讨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等问题，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接受达林的建议，于1922年4月底5月初在广州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中共广东党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达林在会上报告了他与孙中山会见的有关情况，指出：孙郑重声明“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鉴此，达林要求中共的领导者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坚持党组织独立性的原则下，加入国民党去实现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与会者经过一番争论后，大多数人“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①。7月，中共广东区党团组织的代表又参加了中共“二大”关于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决策的制定。

同年8月，孙中山经受陈炯明叛变的沉重打击后抵达上海，急切地“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②。这期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说服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孙中山在求同存异、各有谦让的原则

①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91、1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下，就两党的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孙中山“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关系更为密切”^①，坚持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联合，同时也允许共产党人保留原有的信仰与党籍做跨双重党籍的党员^②。中共方面则同意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以建立两党的党内合作，同时坚持要保持共产党政治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立场在后来党代会的决议中鲜明地表达出来：“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③。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还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有关国民党改组的会议。其后，又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开始后，孙中山于1923年3月初重新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最初，他因忙于讨沈讨陈战事，一度将改组工作停了下来。中共中央为了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进一步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便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进程，促使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决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

① 转引自《党的历史资料》，第510页。

② 参见陈锡棋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00页。

③ 转引自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58页。

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东地区的党、团组织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取得圆满成功，作出了努力。

中共“三大”召开前，总书记陈独秀和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到广州筹备“三大”，并和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广东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偕同陈独秀等人以“国民党员”名义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建议孙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同时注意完善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中心地区的组织，以加速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程；他们还请求孙结束广州的战事，将精力放在这“属于首位的重要任务”上面^①。谭平山还与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等人一道承担了筹备“三大”会议的一切事务性工作，诸如选择会议召开地点，妥善接送代表和安排食宿，印刷大会的文件，布置会场并负责保卫大会人员的安全等等。中共广东党、团组织为党的“三大”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党的“三大”召开后，广东地区党、团组织选出的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冯菊坡等出席了大会，罗绮园则列席大会担任记录。这次大会批判了党内为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及右倾观点，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

^① 转引自《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268页。

线。”^① 并强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必须达到以下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② 在会议的进程中，广东地区的代表积极拥护支持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正确主张，谭平山还与毛泽东一起为大会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并在第五天的会上作了发言，为大会制定国共合作方针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时，广东党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被与会代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中共广东区委成立，谭平山又当选为书记，他还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驻粤委员，具体负责指导广东地区党、团组织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工作。

党的“三大”闭幕后，广东地区的党、团组织坚决执行“三大”制定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付诸实践，集中主要精力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加速进行。陈独秀后来同苏俄顾问谈到这一点时曾指出：当上海等地组织对“三大”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的正确性尚存疑虑之际，“广州党组织在‘三大’后立即表示赞成大会的决议”，这正是广东党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要比上海等地做得好的根本原因^③。广州地区的团组织也“时常想法子

① 斯诺：《毛泽东谈国民革命》，《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404页。

③ 参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8页。

来改造国民党”^①。党中央后来在赞扬团广东区委的这种积极态度和工作精神时指出：各地团组织的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S. Y. 均参加。”^②

广东党、团组织执行“三大”决议，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协助苏俄顾问鲍罗廷力促孙下决心召集改组会议，建立国民党改组的领导核心。苏俄顾问鲍罗廷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后旋即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教练员和政治顾问。“他到广州的最初四个月，完全用于处理改组国民党问题。”^③

10月9日，中共中央驻粤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以及党、团广东区委成员刘尔崧、罗绮园、郭瘦真、施卜、黄侠生、张元恺、蓝裕业等人出席了鲍罗廷召集的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共同“磋商进行改组国民党方略”。会上，谭、阮等人如实地向鲍罗廷介绍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近状。谭平山说：“孙中山的大本营……即好比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总部”，“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中心。形形色色的、往往是彼此对立的人物，都集合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共和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同商人及

① 阮啸仙：《一年来之S. Y. 粤区》，《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81页。

② 《党的三届一中全会文件》，1923年11月。

③ 《米哈依尔·鲍罗廷（1884—1951年）——支配广东的人》，《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23页。

资本家一起加入国民党，是屡见不鲜的。”^① 针对整个国民党有领袖而无组织和党员成分不纯等情况，广东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必须实行改组，才有新生的希望。他们遂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②。平时，谭平山等与鲍罗廷保持密切联系；鲍罗廷也时常走访谭平山及孙中山，沟通广东共产党人与孙中山的关系，以便“直接通过孙中山来把共产党的建议付诸实施”^③。这期间，广东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很快在国民党内积极展开工作，以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全面进行。

在鲍罗廷和广东共产党人的推动与帮助下，孙中山终于将一度搁置下来的国民党改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23年10月10日，国民党广东支部召集了为期1周、有跨党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员恳亲大会，讨论改进党务诸问题。会间，孙中山于11日、15日两次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以往“日见退步”和“势力未能增进”，原因在于“党中缺乏组织”、“基础未固”和“革命精神”消失^④，强调国民党改组之必要，认为“要想振兴党务”，“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去淘汰”^⑤，进而“效法俄人，……振刷精神，实行奋斗”^⑤。恳亲大会结束后，孙中

①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7—28页。

② 《广东区群众运动状况》，《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编》，第20页。

③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6页。

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第281页。

⑤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8—269页、第334页。

山于10月19日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24日又特派廖仲恺、谭平山等14人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为此致函国民党全党，谓：“兹委派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②至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广东共产党人的具体参与帮助下，迅速有条理地开展起来。

(二)

发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在广州进行的试点工作，按照正在拟订中的国民党新党章的要求建立和健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在完成改组筹备工作和改组试验的过程中壮大国民党的力量，这是广东党、团组织为国民党改组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东省财政厅顶楼召集了有50多人参加的改组特别会议，跨党的共产党员谭平山等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主持下，主要商讨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及纲要。廖在会上再三强调应该按孙中山的计划改组国民党，这一意见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28日正式成立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担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他与廖仲恺实际上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中坚；谭、廖在实际工作中密切协作，力排干扰，从而保

证了国民党改组各项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头绪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思想整顿及组织改组两个方面。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在谈到这两方面的任务时指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①当时国民党改组的活动中心在广州，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张太雷驻广州协助鲍罗廷，帮助孙中山及国民党制定正确的党纲，端正奋斗的目标，完成国民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下的思想整顿任务。而帮助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组织改组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如去掉腐化分子、吸收革命新鲜血液、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使国民党的各级组织革命化等等，则主要由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党、团组织承担起来。

1923年10月30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组织改组的试点工作，按行政区域将全市分为12个区进行党员登记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区分部为主的党的基层组织，并改进发展吸收党员的办法。很快，这项工作自11月初全面展开。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亲自担任广州市党员登记委员会委员，并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负责一个区的工作，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则在第一区进行工作，广大党团员也都积极地参与

^① 参见《孙中山年谱》，第322页。

了这项工作。

广东党、团组织为了更好地帮助国民党搞好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还于11月中旬成立了由谭平山、阮啸仙领导的国民运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推动国民党改组的进程，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研究与确定广东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方针与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1. 联络勇敢向上、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工人、学生等，成为国民党中之左派；2. 对于糊涂投机式的（国民）党员，取猛烈攻击的态度；3. 对于游离分子，以感化政策，缓缓使之趋向左派。”^① 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国民党改组成真正的革命中心势力，使“国民党自改组后的政策，与我们国民革命的政策很相合。”^②

(二)做好国民党改组的思想发动及登记党员、健全组织等工作。在思想发动方面，共产党人通过参加党员大会和组织各团体的国民大会宣传反帝反封建政纲和进行国民革命之必要，同时积极宣传国民党改组的意义。在具体发动与组织群众方面，共产党人特别注意在国民党区分部做“下层工夫”。为此，在有中共党员和团员之各区，就由党、团同志共同组织一个国民运动委员会小组，“以定策划”；人少或无党团员之区，则“设法联络青年工人、学生，秘密

① 《阮啸仙文集》，第106页。

②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66页、83页。

组织其他团体，受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指挥^①”。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区分部所进行的“下层工夫”主要包括：召开党员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事宜，调查工、农、学等各阶层的情况，进行各区分部的党员重新登记，指导各区分部的选举和建立各区的基层组织，吸收与发展新党员，等等。

（三）从实现国共合作的革命大局出发，经常教诫督促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团员们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搞好与国民党人的关系，努力做好革命工作。国民运动委员会针对一些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人参与改组、散布流言等情况，经常劝诫同志：“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拿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至对于政策，我们决不稍让，以保存我们的固有精神。”^② 同时要求参加改组的同志“活动务须审慎”，“尤要尽量表现能力，以取得该党及社会一般之信仰”^③，应该将改组好国民党“认为分内之责，不好表示骄傲”，遇有不恰当的批评时，“都要‘忍辱负担’，努力向前，干！干！！这是革命家唯一的信条”^④。这些成为参加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的党团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准绳。

广东党、团组织的成员埋头苦干、劳怨不避，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同国民党员一道完成了广州地区国民党党员党籍登记，以及建立区分部与区党部等项改组试点工作。广州地区的国民党党员登记人数在1923年11月11

① ③ 《阮啸仙文集》，第106页。

② ④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81—82页、第82—83页。

日前共 3649 人，到 1924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一大”召开时，登记之党员为 8218 人，“两个月期间，实新增党员四千五百六十九人”，成分“多是青年学生与一般有职业之工人”。国民党基层区分部由原先的 12 个增加为 69 个，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 12 个区党部。这样，广州地区的国民党组织依据新党章草案，终于“将从前自上而下的组织，变成自下而上的组织，基础较为稳固”^①。

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广州国民党改组试点中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克己奉公的革命精神，深得国民党人的同情和赞赏。在各区选举职员时，共产党员中不少人得的选票超过国民党员。结果一批广东党、团组织的骨干被选为国民党区党部或基层区分部的职员，担负了实际领导工作。例如在第一区，阮啸仙当选为区党部秘书，刘尔崧当选为区党部组织委员。该区下有 5 个基层区分部：张元恺、周基鉴、张善鸣预选为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蓝裕业、杨石魂当选为第二区分部执行委员；郭瘦其、沈厚堃、郭寿华当选为第二区分部执行委员。在第二区，施卜代理区党部执行委员和秘书。在第四区，杨殷当选为区党部执行委员。在第五区，黄觉群当选为第五基层区分部执行委员。在第七区，邹师贞当选为区党部秘书；黄居仁、赖国航、关肇康、卢季循当选为区党部执行委员；邹、黄还与周文雍一同当选为该区第三基层区分部执行委员。在第十区，区党部事

^① 《谭平山文集》，第 272—273 页。

务由杨匏安、潘侠夫代理。有 20 多名共产党人分别被选为 7 个区党部、5 个基层区分部领导成员这一事实本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党、团组织为广州地区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广州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还陪同廖仲恺于 11 月底赴上海介绍广东改组试点的经验，为上海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

广东党、团组织在排除国民党右派对改组的干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巩固国民革命基地广州的革命政权和保证改组工作顺利完成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重大决策，在当时得到许多国民党人的拥护与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反。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内“一班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恐怕国民党改组好了于自己不利。”^①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实行“联共”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和参与改组工作进行中伤和诽谤。1923 年 11 月邓泽如等 11 人上书“弹劾”共产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①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 82 页。

当时，中共广东党、团区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右翼反对派的活动，不仅针对国民党的改组，而且无疑也是针对共产党员的”，为了排除来自国民党内妨碍改组工作进行的阻力与干扰，广东区党、团组织于11月18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及与国民党右翼反对派作斗争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加紧工作、坚决同右翼反对派斗争的决议，一致认为加强群众工作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为此，会议强调要配备党、团员力量，加强在国民党内的积极工作，以扩大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会议还决定向那些没有共产党员的地区调派党员，即使每区1名也好，而在那些至少有3名党员工作的地区内建立支部，并要求迅速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以每周讨论1次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地区组织的工作问题。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的配合，大大有利于同国民党右翼的斗争，从而推进了改组工作。

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还受到外部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仇视与破坏。1932年春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开府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先是怂恿北洋军阀吴佩孚挑唆沈鸿英叛变孙中山，从粤西北进击广州；后则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军在东江发动攻势，以图反扑广州。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被迫紧急发动讨沈、讨陈战争。当时，中共广东区委曾派徐成章、徐天柄、鲁易、俞秀松、曾西盛等同志奔赴前线参与

讨陈战事，阮啸仙也亲临博罗察看战情和慰劳讨陈联军。10月，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后，陈炯明叛军加强了对惠州、博罗、增城一线的攻势。当时，与陈炯明叛军对峙的滇、桂讨陈联军缺乏斗志，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头目且拥兵自重，动辄不听革命政府军令；广大民众也由于受到滇、桂军强拉民伕、抢掠奸淫的骚扰而不满，加之不明白革命政府讨伐陈军的目的，大多“对孙政府的命运不闻不问，将政府的成败看作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①上述情形，无疑使讨陈战事大受影响。11月初，陈炯明叛军进占博罗、石滩等地，威逼广州。孙中山于11日发布反击叛军的命令，并亲赴石龙前线督师，但滇军等遵令开到指定地点的兵力不到1/10，结果造成石龙大溃退，陈军进至广州郊区，市民颇为惊恐。形势颇为危急——“广州眼看就要陷落，……孙中山政府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方面战斗的最终结局。”^②很明显，如果改组基地广州一旦失守，正在紧张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就将夭折。

在广州革命政府及国民党改组工作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在共产党人支持下，于11月13日后连续几天召开广州各区国民党“区主席、组织员、秘密执行委员等联席会议，议决组织义勇军，以御敌人；组织慰劳队以慰劳

① 《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8页。

②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页。

前敌义军，并向军队宣传党义。”^①

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区委的领导骨干不仅参加了上述联席会议，而且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会议的两大决定，为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保障国民党改组工作的顺利完成做出贡献。

谭平山、阮啸仙等紧密与廖仲恺配合，全力进行成立“国民义勇军”的工作。谭“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响应号召，带头报名参加，带动了450人加入义勇军”^②；阮啸仙也与刘尔崧等一起深入各区动员青年团员参加义勇军。“到15日，已招募了540名志愿兵，并送往前线”^③。16日，青年团广州地委又专门发出了号召团员、青年热烈应征入义勇军的第十号通告。通告指出：“当此（国民党）改组乃未十分就绪的时候，东江战事忽形紧张，广州市面人心动摇，改组的进行与国民党的根据地，也将受些影响。这是努力做国民革命的人——尤其是青年，应该设法的。国民党已经发起组织义勇队，以党员为基础，再征求表示同情国民革命的（人）加入。……我们努力革命的青年，凡与已联合的团体，更应全体加入，表示我们对于革命的勇敢与联合战线的真诚。”通告最后要求各团支部“马上召集会议，速将加入名册交来。至紧！至紧！”^④ 国

① 《谭平山文集》，第274页。

② 元邦建：《谭平山传》，第44—45页。

③ 《鲍罗廷来到广州》，《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199页。

④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54—55页。

民义勇军成立后，旋即负起后勤支援乃至直接投入讨陈战斗等多项使命，在援助前线将士打退陈炯明部的进犯、保卫广州革命政府与改组基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在发动党、团员参加义勇军的同时，还努力动员广大民众支援前线，积极组织慰劳队慰劳前线将士。国民党临时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作出支援前线将士的决议后，“与此相适应的是，广州的共产党员通过一项决议，委托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区组织去支援滇军某部和湘军某部。决定立即募集数千元现金、粮食和衣服等等，并按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规定的办法，各地区打着各自的旗帜把所有这些东西送到前线去，此后与被援助的部队保持经常的联系。”^① 阮啸仙等人遵照党的这一决定，以中共党员及团员跨党人数最多的广州国民党第一区分部为基础，联合新学生社等团体，组织了一支30余人的慰劳队。队员们分头向党团员及广大市民、工人、学生等劝捐募饷，很快募集了一批现款与物资。慰劳队在队长阮啸仙、理财科主任郭瘦真等带领下，先后赴仙村、石龙前线阵地，慰劳抵抗陈炯明叛军进犯的各军官兵，大大鼓舞与振奋了他们的战斗士气。

滇军范石生、豫军樊钟秀及湘军一部等在国民义勇军的协同下，于11月19日击退了陈炯明叛军对广州的4路进攻后又乘胜反击，将陈炯明叛军逐回惠州以东地区。广

^①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页。

州保卫战的胜利，稳固了广州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改组的基地，保证了国民党改组各项筹备工作得以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顺利进行下去。这一胜利还初步显示出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国民党改组工作给国民党带来的活力与朝气。

1923年12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决定收回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主权和争回被扣的“关余”税款。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在这一正义行动面前立即凶相毕露，派出军舰17艘溯珠江驶入广州内河的白鹅潭，进行武力恫吓。广州革命基地又一次面临被帝国主义颠覆的危险。当时，广东的党、团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声讨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誓作革命政府后盾。12月16日，中共广东区委召集有各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决议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力争关税主权，……举行大示威运动，并以经济绝交为最后办法”。24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在第一公园召开有80余团体参加的市民万人大会，阮啸仙主持大会，谭平山、冯菊坡、李之龙、张瑞成等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群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收回关税”、“抵抗列强”、“抵抗英美”等口号。当日还散发了《国民外交后援会对内对外宣言》及中、外文传单3种。这一斗争显示了民众的力量，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英、美等被迫撤走军舰，并同意将被扣的“关余”交给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接收。共产党人支持孙中山收回“关余”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广州革命政府又一次转危为安，而且还使改组中的国民党迈出了“和帝国主义冲突

的第一步”^①，有利于国民党改组的深入与以后国民革命的进行。

在排除内外干扰和稳固广州革命基地的斗争过程中，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50多天里先后召集改组会议28次，通过改组筹备工作的议案400多项。身兼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谭平山除与廖仲恺一道赴沪工作期间外，留粤时几乎每次国民党临时中央召开会议都参加，为改组筹备工作的进展与完成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国民党各项改组筹备工作就绪以后，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东高师召开时，谭平山又被孙中山指派为国民党广州特别区的“一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间，谭平山除负责中共党团指导小组的领导工作外，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国民党党务报告，并担任了大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党章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为保证大会圆满地完成国民党改组工作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国共两党成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产生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而最后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任务，正式建立起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① 参见《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甲1，第272页。

国民党“一大”后，中共广东党、团组织又派出其优秀分子参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与实际工作，计有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杨匏安担任组织部秘书，彭湃担任农民部秘书，刘尔崧担任组织部指导员，张善铭担任青年部秘书，冯菊坡担任工人部秘书等。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们为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革命联合战线，继续做出了努力与贡献。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在孙中山晚年于广州完成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过程中，中共广东区党、团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地利”的优势，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广东的共产党人在帮助确立国民党改组方针计划、进行改组思想发动、搞好广州改组试点，以及争取国民党“一大”圆满完成改组任务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历史还证明：实现国民党改组与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是孙中山晚年的伟大历史功绩。这既是孙中山英明决策和领导，以及革命的国民党人努力奋进的结果，也是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大力推动与帮助工作的结果。孙中山晚年的进步与建树，的确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广东地区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甲申三百年祭》的首次发表 与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

刘 昌 亮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全文连载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近两万字的史学力作，重点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论述过程中亦深刻地揭示了明末朝廷“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的腐败导致其最终覆灭的历史必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第3天，即抛出了陶希圣的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大肆攻击、指责郭沫若的文章是“影射当局”，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与国民党的反应截然相反，《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却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尤其是引起了正在领导“延安整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倍加赞赏，充分肯定，他亲笔批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解放日

报》遂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将《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分两次刊出，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于延安举行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也语重心长地告戒全党：“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

《甲申三百年祭》还在延安印行了单行本，各解放区也相继印发。这一时期，为配合延安整风，深入批判广泛存在于各级干部思想上的那种居功自傲，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苏联话剧剧本《前线》。该剧辛辣地揭露和讽刺了一个叫戈尔洛夫的苏军高级指挥官依仗自己过去的战功而骄傲自满，不求上进，思想顽固、封闭、保守，最终被撤职的故事。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通知，指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剧本《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前线》中的总指挥戈尔洛夫“倚老卖老，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致在战争中屡犯错误，终被撤职。通知特别强调指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948页。

“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① 中宣部的通知还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

毛泽东和中共中内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并反复强调，在党内要警惕胜利后就骄傲的毛病。他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信中还谦虚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② 毛泽东这种谦虚谨慎，严以律己的精神和品德，在延安整风中为全党广大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延安的文艺界，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配合整风，排演了苏联话剧《前线》和有关闯王李自成的戏剧。每当周末，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汽灯高悬，党政军各级干部济济一

① 《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443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堂，观看话剧《前线》或是京剧《红娘子》、《北京四十天》等戏，戏中的故事和人物则深深感染着每一个看戏的人。人们嘲笑戈尔洛夫的盲目骄傲自大和他的不学无术、顽固、保守；人们也为闯王李自成部下将领牛金星、刘宗敏进北京后沉湎酒色、贪赃枉法而气愤；更为闯王听信谗言杀害李岩而痛惜。很长一段时间，话剧《前线》和李闯王的故事成为延安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就连小孩子们都知道戈尔洛夫、李闯王、红娘子、李岩这些人物。可见《前线》和有关李自成的戏剧，当时在延安影响之广泛。

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参加整风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条件的也通过观看话剧《前线》和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小册子，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如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淮北区党委书记刘子久，在《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未深入，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地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学习的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①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话剧《前线》和郭沫若先生的史作《甲申百年祭》汲取政治营养，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优良作风早日得到普及。刘子久的这封信，毛泽东指示中宣部广为印发，并要求各地除在报上发表外，还要将该信作为各

^① 该信全文载于1944年7月27日《解放日报》。

地党校、军校、训练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学习教材之一。

当年在苏北解放区参加整风的老干部曾回忆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实际，作了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经验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很长，打败了日本鬼子，还不是革命成功，天下太平；进了城，也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①

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面貌率领全国人民投入争取中国实现光明前途的斗争，并因势利导，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又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夺取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发扬民主，反对骄傲，反对腐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总结古今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重要思想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巩固人民政权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

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快就要实现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再次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

^① 曹晋杰等《〈甲申三百年祭〉在盐阜等老解放区的影响》，载《郭沫若研究会会刊》1983年总第二集

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特别提醒全党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毛泽东这一著名论断，后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防微杜渐、抵制腐化的座右铭之一。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要离开河北西柏坡前往北平。3月23日这一天临行前，毛泽与周恩来又有一段寓意深长的对话提到了李自成。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②两位人民领袖这一段含义隽永的对话道出了一个他们共同的宿愿，那就是共产党进北京，绝不能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从延安整风到全国解放，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历程中，这篇史学论文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有关封建王朝兴亡更替的谈话，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有关中国共产党决不当李自成的对话，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哲理——胜利后，不能骄傲，执政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② 薄一波：《若干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不能腐败。只有这样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封建王朝兴衰“周期率”。这就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给我们的历史启示。诚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的回顾》中所指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①。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郑雅茹 柳建辉

以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从此开始，到全国农村于1982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权止，人民公社存在了近25个春秋。那么，“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如何兴起、如何发展的？最后又因何而停止？本文将就此作一系统介绍。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早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在加速合作化进程的思想指导下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

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① 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是强调小社并大社“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但急于由小社进入到大社的思想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多，纷纷闹退社等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发出若干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控制社的规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提出“村和生产队组织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等等。然而，这个方针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的执行。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此后，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该《意见》于4月8日被中央政治局批准），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党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258页。

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他任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文章在介绍一个合作社办工业的情况后说：“把一个合作社变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一种新的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陈文还说：“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事实上，陈伯达在发表此文之前到北京大学讲话时，已经把毛泽东的上述构想披露出来了。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由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

8月上旬，毛泽东带着极大的兴趣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多次与当地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大社可以包括工、农、兵、学、商。当地负责同志在汇报情况时，也大都强调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

在河北视察时，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对徐水的工作特别是对其军事化大加赞赏。当听到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全县秋季收粮可达11亿斤时，毛泽东很高兴地问道：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应该考虑到

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他同时提出搞人民公社的问题。8月5日，当张国忠在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时，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至8日，毛泽东又来到河南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等地，再次表示了喜悦赞扬之情。当地领导同志汇报了他们对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的缘由。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善于捕捉信息的记者，将毛泽东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好”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于是，人民公社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人民公社开始兴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村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10个文件，教育方面1个文件，及其它方面9个文件。

会议基于对 1958 年粮棉等农作物的高估产和急于超英赶美、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向往，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并于 8 月 29 日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 6 个部分，主要内容是：

1、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2、关于社的组织规模，认为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 and 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3、关于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决议》认为，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4、关于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决议》强调，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

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地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它们自然地变为公有。

5、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问题。《决议》规定：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①。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6、强调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决议》说，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① 这个提法是毛泽东提出加上去的。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1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①，加入农户1.1亿多，占总农户的90.4%^②，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之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

① 全国原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

② 到1958年12月，据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文件的记载，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已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1.2亿多，占总农户数的99%以上。

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与此同时，《简报》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未来设想，指出：继续解决体制问题，健全经营管理工作，是巩固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有的地方在建立公社以后，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在生产管理上曾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公社体制问题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社、大队（作业区）、生产队的分工范围和职权问题。其次是国营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与公社合并问题。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由于社、队规模的扩大，生产项目的增多，分配制度的改变，军事化，战斗化，大协作的实行，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等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新形势。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将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

按当时的提法，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社的规模比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且在实际并社过程中，形成了越大越好的心理。全国平均 28.5 个农业社合成一个人民公社，大部分地区一社都在 4000 户以上。二是经营管理范围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原初级社、高级社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人民公社则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所谓公，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公社已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即政社合一），公有制成分增加；二是把社员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收归社有，消除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三是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搞公共食堂等所谓公益事业，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9 月 14 日，《红旗》杂志公开发表了河南省遂平县《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该社遂成为各地办社的样板（这是由陈伯达、张春桥到该地调查时搞出来的）。该社《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大公社后，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全部自留

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所有。生产大队（管理区）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社社员不管家中劳动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免费供应粮食。于是，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公共食堂，全国共计有数百万个食堂，并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当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①，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经过3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甘肃的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②在这方面（即急于过渡），当时比较突出的是河北省徐水县和山东范县（今属河南）两地。

徐水县通过搞供给制，进行了全县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8月初毛泽东视察该县后，8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即来到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在中央、省、地委的帮助下，县委于8月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又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①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5页。

② 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1980年1月15日）。

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同时，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的“15包”：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丧葬。当年的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在国内外都有极大影响，曾吸引了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来宾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去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后也伸了大拇指，上报赫鲁晓夫知道后，赫又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但这个试点很快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财力物资方面的匮乏，导致经济上难以负担，计划指标无法兑现。虽经县里多方面筹款，甚至挪用商业资金，也难以持续，最终使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当时，山东省范县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并编了一首顺口溜：“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毛泽东批阅了该县的规划，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他还派人前去调查，了解情况。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基本上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

8个月的纠“左”

北戴河会议之后两个月的大办人民公社，用毛泽东的说法，是“乱子出了不少，与秋冬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①对于公社化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左”的错误。这次纠“左”，历时8个月，是一个陆续发现问题，认识逐步深化，不断进行纠正的过程。虽然许多问题纠正得还不彻底，但这个过程中得出的一些正确方针和政策，对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必须划清两种所有制界限，不能陷入超阶段的空想，急于过渡。

毛泽东首先从办人民公社的一些混乱中，发觉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无偿调拨，剥夺农民的问题，并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进行纠正。

在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党委书记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指出：

1、必须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

^①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象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是，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2、在社会主义时期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商品生产要大发展。针对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他说，必须区别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不应当害怕商品生产。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在农民问题上，必须谨慎小心。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恩、列、斯对于商品和价值法则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于11月9日写了一封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4级党委委员的信，建议读两本书，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还亲自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这次会议虽然对人民公社化错误没有也不可能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毕竟是纠正“左”的错误的开端，为以后继续纠“左”奠定了基础。同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着重地讨论了高指标和

浮夸风方面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地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初步地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毛泽东还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在上述两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在听取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后，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肯定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前提下，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反对和纠正了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界限，以及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决议》共有8个部分，概括之，其要旨有3点：

第一，强调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决议》强调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第二，强调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决

议》告诫全党：无论是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第三，强调坚持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希望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决议》还澄清了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明确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混乱，对于纠正实践中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它又只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两个外部问题，尚未看到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即：管理体制上仍是管理区一级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同时还继续强调供给制的“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等。

这就很难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共产风等弊端。

(二)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逐步明确生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提出生产小队所有制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毛泽东于1959年2月下旬亲自到河北、山东、河南3省视察，继续研究人民公社问题。他进一步发现，由于实行公社化，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紧张情况，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共产风”还在继续等等。经过1个多月的思考，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这一重要环节入手，解决由公社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召开后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调整公社内部所有制和解决“共产风”等方面的问题。

其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强调目前应当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在列举了党在同农民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紧张状态后说：人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他反问道：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拥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有些地方叫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作了分析和自我批评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

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

第二，强调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批评“共产风”实际上是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

第三，再次重申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他强调要检查和纠正这两种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阅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时，还在决议中提到批评本位主义的地方，写了一段批语：“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人们常说的14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

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毛泽东还提出了在清理“共产风”时过去的旧帐一般不算的意见。从此开始，到1962年2月，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相当于原高级社）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第二次郑州会议虽然认识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公有水平过高这个实质性问题，但只决定降到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础，仍然偏高，规模也过大。尤其是生产小队所有制问题尚未解决，加上供给制问题没有解决，因此，纠“左”不可能深入彻底，这是当时的局限性。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围绕着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各地又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亲自关注着这一工作的进行，并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1959年3月10日，毛泽东到湖北视察时通过批阅各省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发现，以河南、湖南两省为代表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以湖北、广东两省为代表则坚决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分歧的出现，原因在于第二次郑州会议说的队为基础就是指的两级，没的明确。为此，毛泽东在3月15日的党内通信中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着重指出：“‘郑州会议’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3月17日，他在另一封党内通信中又进一步提出，“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

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和陶鲁笏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很关键的，对于完善公社管理体制，正确看待生产小队的权限，纠正“共产风”极有益处。毛泽东通信中还特别告诫基层党组织的同志说：“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59年4月初，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形成了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简称《纪要》），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新规定，并进一步解决了一些“左”的问题。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纪要》规定：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人民公社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相当于原高级社的单位，有些地方是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这里把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明确规定为相当于高级社，强调重点与第二次郑州会议不同，是一个进步。

尤其重要的是，《纪要》明确增加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一节，为以前所没有。其中指出：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种权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队对于土地、牲畜、劳力等生产资料有固定的使用权，不得任意调动；二是小队有权对增产技术措施的实施作出决定；三是小队的超产收入，除按一定比例上缴外，其余归生产小队所有和支配。

这些新规定，明确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一部分具体问题，标志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其指导思想是为了避免急于过渡，尤其是急于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克服公社、生产队规模过大、统一核算造成过分集中、贫

富队拉平、损害群众经济利益的缺陷。当然，当时所达到的认识仍有局限性，比如，在进一步整社中，各地农村又提出了“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取消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调整措施，但这些问题并未引起中央重视，这表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仍有一段距离。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毛泽东还根据各地群众在整社中普遍提出清算旧帐的要求^①，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3月30日，他在审阅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一份报告时写下了一段重要批语：“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会议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此后，《纪要》作为中央指示正式提出，要“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帐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帐，建立新帐”，“原则上过去的帐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代。”4月3日，毛泽东又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给他的信及转来的报告上明确批示：“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再次通过党内通信，要求各地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播种积

^① 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帐目。

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节约粮食、要讲真话等。尤其是针对浮夸风、高指标等不良现象，他特别强调要讲真话，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的话反映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给予坚决反对浮夸，敢讲真话的同志以极大的支持。从1959年5月1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对旧帐和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指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的指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等文件，继续调整因大搞人民公社而引起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等错误政策，缓解了党和农民群众的紧张关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8个月纠“左”，由于全党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党和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认识观点，形势毕竟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是在基本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左”的错误，因而是很不彻底的。虽然改正了某些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却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平均主义的东西；虽然批评了急于过渡的急性病，放慢了过渡的时间，但预定的过渡时限仍然是很快的。两次郑州会议都提出要10年到20年实现两个过渡，这虽比北戴河会议放慢许多，但仍是脱离实际的，仍没有摆脱在10年至15年内或再多一点时间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战略目标。其目的，仍是在为所谓“大跃进”创造条件。

庐山会议后的“新跃进”及继续纠“左”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自此1958年11月以来党中央纠“左”的进程开始被打断，党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上也出现反复，随之导致了1960年上半年的“新跃进”，并在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引导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总结教训。并以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关系问题和克服平均主义为主要内容，一度又开始进行纠“左”的努力。

（一）庐山会议后，认识上的反复。

1959年10月，农业部党组向中央报告说：“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大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时对此定性说：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对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地予以“揭发批判”。这就使急于过渡风又重新刮了起来。1959年底，浙、皖、苏、沪4省市召开了一次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的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过渡的条件和时间问题。座谈会认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是更长一些时间才行”。座谈会提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并将“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改为“小部分所有制”，且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为什么这次会议如此提出问题？关键还是来自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首先，座谈会的召开主要是讨论谭震林代中央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和分配问题若干意见的报告（草稿）》，但在这一文件中又提出了一些“左”的东西；其次，当时毛泽东认

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又开始了发展社有经济，向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试点。到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时，中央更不切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后各省为继续“大跃进”，创造过渡的条件而纷纷大办县、社工业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

（二）从批转广东省委《指示》到写出《十年总结》，毛泽东初步认识到“大跃进”的严重问题并着手纠正。

“新跃进”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和一些省的省委便意识到“共产风”的严重问题。1960年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做出了《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3月5日中央附上意见后将指示转发全党，这表明党和毛泽东开始发现问题并着手纠正。

广东省委的指示，是根据陶铸和胡乔木到顺德县的调查及省委调研室和调查报告发出的。《指示》共列举了5个方面的失误问题，并指出其中3个是主要的：一是过渡问题。认为从目前广东省的情况看，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一般是不具备条件的。不应急于过渡，急于赶先。二是发展社有经济问题。认为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公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决不能独立地发展社有经济，更不能削弱了大队经济，采用“割肉补疮”的办法。三是分配问题。认为高积累削弱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限制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总之，在发展社有经济上实际是在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广东省委的《指示》引起毛泽东的重视。3月1日，他亲自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谈了自己的意见，此后中央政治局又进行了讨论并于3月5日将讨论结果作为中央指示同广东省委的《指示》一同批转下发。中央还着重指

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的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并在大会上宣读。他结合近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对建国后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和反思。关于人民公社，他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他认为产生乱子的原因，主要是一些领导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承认几年来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同时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并强调“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还写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倡导实事求是原则，是难能可贵的，这表明他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对不久后国民经济转向调整和进一步纠正“共产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央《紧急指示信》，提出了要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风，以及整风整社和两个“至少”不变等一系列措施。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在集体

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会议要求各地进一步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在5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但这次会后，又有两个省（湖北和福建）的报告反映了急于过渡、刮共产风等严重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0月10日，他给李富春写信，说两省报来的文件极好，请他找中央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李富春经与有关同志几次讨论，草拟了《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批示》，于12日送毛泽东审阅。当天，毛泽东即批示下发。中央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

为了更快地纠正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又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也于11月3日对《指示信》的起草稿亲自作了认真修改。如信的原稿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毛泽东在后面加写了“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并将“至少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又如信的原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侵犯了的必须坚决纠正。”毛泽东将其中“在一定时期内”改为“在一个长时期内”。再如信的原稿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将此改为：“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将此改为：在现阶段，在很长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的分

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

《紧急指示信》经毛泽东修改后，明确规定了过渡的时限，提出两个“至少”不变，对扭转当时农村的严重形势起了积极作用，说明党中央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了生产关系的变动问题是人民公社所有制的重大问题，也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循着这个思路，毛泽东抓住问题不放，继续致力于纠“左”。

11月15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同月2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以中央的口气说（实则是毛本人写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和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再次作的自我批评，以及他对错误的剖析，对进一步纠“左”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反映了他本人的认识也在向前发展。

（四）从《农业六十条（草案）》到《修正草案》的形成，党和毛泽东重点解决所有制规模过大和两个平均主义。

1、克服困难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到1960年底，“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和农村中

出现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纠“左”的实践中感到，要使广大干部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是克服当时困难，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一着，意义深远。

在上述两个会议上，毛泽东谈到纠正共产风、急于过渡等错误时，总是联系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12月27日，他在听取各中央局同志汇报时插话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它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今后若干年内，要小办社有经济，大办队有经济。有大必有小，不能同时搞两个大办。”12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谈到退赔问题时又说：“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为了退赔，把县、社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当有人汇报，整风整社开始后有人提出要讲大办等成绩时，也从“一个指头九个指头”出发，毛泽东说：“先讲‘一个九个指头’好不好？现在是八，二，也不是一个指头，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一个框框。”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1959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讲到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太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

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又总结经验说：“我们讲情况要明，决心要大，办法要对，情况不明，决心就没有法子大。刮共产风的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那个时期非反右不可），在全国一宣传，就把没有把共产风搞得彻底的情况掩盖了，又刮起来了。”

2、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工作组赴基层调查研究。调查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以及体制、社队规模等问题。为此，从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将他直接关注的3个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此后，条例的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他的一些谈话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3月5日，他在广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你明年也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小队就有问题了，有个小字他们就没有权了，小字可害死人了，不要小字就好办了，就叫生产队。”3月7日，在与王任重谈到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毛泽东又说：“其目的就是要把公社各级的职权搞清，把生产小队不叫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

这些谈话表明，毛泽东在公社所有制规模的认识上更进了一步，明确提出变生产小队为生产队，增加自主权。实际上，他这时已经有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想法了。他对3月10日河北省委写的《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批阅，亲自加了醒目的副标题：主张生产小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这一点，在毛泽东以后的讲话中几次提到。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①，专门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也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②讨论农业问题。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没有可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指出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领导干部不亲自调查是不懂得也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

3月14日至23日，“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召开，这就是中共中央广州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讨论中，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虽然毛泽东已有倾向后者的想法，但由于与会者多不同意，会议对此没有作结论。经过几天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会议于22日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草案）》。次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调为调查研究的长篇讲话，强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谈到《农业六十条（草案）》时，他说：我们把中央《紧急指示信》修改了，那些命令主义的口气都刮掉了。执行改为实行。我们作个君子协定，大体上试一个月、半个月或一个半月，你们搞一下，搞出点经验再来修改。

广州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公

① 即中南、华东、西南3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

② 即华北、西北、东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

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会议通过的《农业六十条（草案）》，较好地集中了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两个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不健全等方面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规定。但条例对于克服两个平均主义仍有局限性，这一点不容怀疑，如仍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三七开，除特殊情形外都要办常年或农忙的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权力仍未下放等。

3、修正草案改变对供给和公共食堂的规定。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通过，但它是不是符合农村的实际？能不能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这成为广州会议后毛泽东苦苦思考的问题。他继续大抓调查研究工作，征询对于草案的反映。3月31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张平化谈话。张汇报说，湖南农村一些干部群众对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等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毛泽东说：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还可以减少，还可以推翻某些条文。将来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分别带领工作组于3、4、5月间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在他们向毛泽东写的调查报告或信件中，均反映了广大社员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不赞成，要求取消等意见。与此同时，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们也大都先后深入下去进行重点调查，并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对这些报告、通信非常重视，仅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批转了10多件。

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农业六十条》的草案

和继续整“五风”。他还要求到会同志利用会前这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等）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为5月会议作准备。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再次对《农业六十条》的草案作出重要修改，形成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草案。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即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还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6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了他的感想并代表中央承担了“大跃进”以来错误的责任。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还说：“一平二调”的彻底解决，是从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这一次中央文件、中央指示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少奇同志插话：坚决、彻底、全部退赔）。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过去了，就没有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恩赐观点。毛泽东并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要检讨。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于6月15日发出了《关于讨论

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分别就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等问题作了规定。6月19日，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到8月份，全国调整后的公社数比以前增加了30478个，生产大队增加225098个，生产队增加1561306个（在3月广州会议通过的条例草案中，将原来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将原来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本文在这里及以后提到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均采用这一新的含义）。

《农业六十条》的修正草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它集中了全党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使得1958年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中的许多弊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服，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扭转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个修正草案也有它当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五）终于作出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到生产队的决定。

1、从1961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到“邯郸谈话会”，毛泽东继续调查农业政策，着重考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并试行后，毛泽东继续关注其贯彻的情况和调查了解农村中尚存在的矛盾。他虽然对草案下发后农业很快开始好转感到高兴，但又担心是否彻底解决了问题？会不会出现反复？因此，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他就召集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开会，询问修正草案的贯彻情况。当大家说到现在农村的情况好一些了时，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同志谈到六十条主要解决了生产队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都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权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权有矛盾。”其实，早在3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就已发觉这个矛盾现象，并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这次，他明确提出对此

问题应加以研究。9月26日，毛泽东召集山东、河北省委的领导同志开了“邯郸谈话会”，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作专门调查。他亲自提问题做记录。在听了河北省研究和试办大包干（即将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的权力下放到生产队）的过程后，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小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牲畜农具，二是分配权。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但倾向是很明显的。

此后，毛泽东又调阅了湖北、河北、山东、广东等省的一些材料，对究竟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作了反复思考。9月29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附去他在“邯郸谈话会”上作的记录和几个省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并明确提出了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他写道：“这些材料表明：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10月7日，毛泽东又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此认真做一番调查研究，并选择一二个生产大队试点，把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2、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中央提出上述要求后，从10月中旬起各省相继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11月9日，邓子恢向中央报告了他10月下旬听取河南、江西两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和在福建省龙岩考察的情况，说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2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示，认为此报告很好。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又到无锡调查，与当地负责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当讲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当有人说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倒退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薄变厚，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田家英等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在起草过程中亲自审改。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提议将《指示》的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并提出要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40年不变。2月8日，田家英再次将《指示》的草案报送毛泽东审阅时附信说：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有一种意见主张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2月11日，毛泽东在田家英短信空白处批了一段话：“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从这个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此时在农业问题上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认为这样做有四大好处，而其最大好处便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

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是继《紧急指示信》、《农业六十条(草案)》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举措。这时，虽然还保留着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就其实质来说已经使农业生产在经营规模上回到了初级合作社时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始终十分注意。在他的关注下，生产队的所有权在逐步扩大，但因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而产生的生产权和分配权不统一的矛盾，一直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才算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6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为调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克服平均主义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举措。当时认为，有了《农业六十条》，再加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一条，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而言，已经基本上解决。因此，当此后有的同志提出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等措施时，毛泽东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致于采用政治批判的方法给予压制。

总之，毛泽东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办好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纠“左”的，他在不断纠“左”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思想和政策，并为它们的贯彻实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不能期望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就能从根本思想上抛弃了人民公社的体制，而应当通过分析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段历史。

这样，从1959年2月到1962年2月，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原高级社）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从1962年2月到1982年12月，人民公社则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相当于原初级社，即原生产小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取消

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党中央又通过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30年不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升级，在“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又有动摇，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左”的违反《农业六十条》的现象，如并队、搞大队核算和联队核算；没收生产队的山林、社员自留地等。这股风当时虽有制止，却由于紧接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出现更严重的现象，尤其是在1975年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变生产队为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又提了出来。1975年9月23日到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建议。会上，由于赵紫阳、谭启龙等的抵制，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建议被搁置。但在1975年10月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还是提出：“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随着这两级经济的发展，“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其后，华国锋又在1976年专门写了一封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示信。以至1976年12月20日，陈永贵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又提出：“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关于发展社队企业一封信的指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逐步地把产、

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促进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就原则同意《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发了通知，该通知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当积极热情，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这就标志着党中央关于公社所有制问题又回到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上来，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倾向再次抬头。此后，各地又一度开始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

这股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刹住。全会再次讨论并决定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和试行，全会还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条件具备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必须调整时，应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分别报请省、地、县领导机关批准”。此后随着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在广大农村的迅速铺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愈来愈显现出优越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则更为暴露。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终于作出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这样，作为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就随之走向了结束。

综合上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对农村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历经20多个春秋，几经演变反复和曲折。从认识发展的阶段性来看，经历了公社一级所有制→公社、大队（管理区）、生产队（原高级社）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大队（原生产队）、生产队（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三个阶段。由于

“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多年来在农村所有制问题上，我们一直处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状态中，造成多次反复和损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虽则，这种反复和损失最终也化作了我们党在发展农村生产力问题上，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丰富政治营养。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前期的“抓革命、促生产”

安建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曾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决定》据此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个文件里，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抓革命、促生产”^①的提法。

然而，历史是最客观、最公正的。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已被社会动乱、全面内战及其所导致的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活生生的事实所无情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大试验”。其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相反，只会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乃至根本动摇。同时，这场“大革命”也是一次“大考验”。

^① 后来又扩充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在国家动乱，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虐横行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党外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立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立场和信念；他们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坚守岗位，坚持生产，钻研业务，忘我工作。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不懈的努力，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遭受严重损失的国民经济，也才能在一定时期或某些方面取得宝贵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周恩来，更是为之付出了巨大勇气、智慧和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以下本文将对“文化大革命”前期，周恩来在特殊环境下，致力于抓生产、抓业务的思想 and 实践作一介绍。

(一)

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响亮地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①之后，在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即1966年初，他又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从北方农业抓起，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这一年夏季前后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造成的“天下大乱”的局势，却打断了人民共和国通往既定目标的进程；作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也正是从这时起，不得不面对他做梦都不曾料想的现实，并开始置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与举步维艰的经济建设之间愈来愈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之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中。

在“红卫兵运动”之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大、中学校和一些党政机关内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国防科研和三线建设等尚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但与以往政治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来势更猛，涉及面更广，其矛头也越来越上指、滥指，大有一发便不可收拾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关注工农业生产的周恩来一方面不得不讲要“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他又再三强调要“‘三大革命’^①一起抓”，强调在农忙季节，“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提出“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等等。这一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是经过周恩来、陶铸等反复磋商、斟酌的一个文件，其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段话，无疑也反映了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真诚愿望。

8月中旬从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将“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并开始涉及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这就在事实上冲破了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政策规定（包括“十六条”中的某些限制），违背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秩序的初衷。今天，详细考察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大量言论后便不难发现，他对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旧立新”，到处“串连”、“点火”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顾虑愈来愈多，劝阻愈来愈频。他于9月初主持起草的《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②，最能反映他这时的许多真实想法，如担心党和国家对内对外工作受到影响，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不能照常运行，公、检、法专政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能，等等。在试图进一步制定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来限制“革命”、保护生产的同时，周恩来还多次出

① 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当时称为“三大革命运动”。

② 这个意见稿，后来被康生等人以种种理由给予否定。

面向广大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的红卫兵与工人发生对立，他们要求工人也应像学生在学校那样搞革命才没有意见。但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放假闹革命。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都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应当说，这篇社论也是反映了周恩来、陶铸等领导同志当时的一些想法的，这就是，在认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纲”的前提下，将“革命”和生产二者分开，以便“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实际上已是对1个月前通过的“十六条”中论点的一种修正，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保证生产业务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的一种设想。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针对中科院科研业务的现状，他特别强调：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又要进行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要大抓“三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讲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眼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的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项目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随后，他在另一场合又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科学院的最大考验。

基于同一认识，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两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于9月中旬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

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两个文件传达后，受到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对趋于更加混乱的局势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周恩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做的就是这样两件事：一是设法将“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二是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例如，在红卫兵大串连期间，他每天都要仔细审看工交部门汇总上来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许多场合对抓紧工农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如他曾针对农业生产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又如他针对工业战线指示说：现在工业方面已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他还曾针对国防科研着重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时间了！

以上事实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发动，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尚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周恩来更关心的问题不是这场“革命”能否真正发动起来、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怎样才能不被这场“革命”所打乱。他曾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二人一吐心中忧虑之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握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

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无论是强调“‘三大革命’一起抓”、“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还是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都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他实际上是接过“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来意义上“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和侧重点，使之成为旨在突出抓生产、抓业务的一种有特定含义的特殊用语了。

(二)

1966年初冬，围绕“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问题，党内上层爆发了一场相当规模的争论，这就是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的一场斗争。从其发生、发展过程看，这次斗争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在“革命”和生产之间矛盾急剧发展、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一年10月初，中央批转了根据林彪“建议”作出的有关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之后，全国很快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也纷纷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节节下降，建设面临停滞的局面。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他一再对国务院有关同志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还特别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① 见余秋里、谷牧回忆文章：《回忆敬爱的周总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载《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但就在这时，被称作“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第三个大动作——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以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实际是为了进一步排除来自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阻力”，宣扬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虽然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生产问题，但周恩来还是抽空听取了有关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汇报，有的老同志也撇开会议主题，呼吁今后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反映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忧国忧民的心情。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继续抓住生产问题不放松。11月9日，他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重申生产建设不能停滞、中断的同时，还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业务的错误论调。次日，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应当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汹涌势头面前，这篇社论却敢于毅然亮出“红灯”，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以外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周恩来所坚持的以上这些论点，不仅与刚刚开过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基调不相适宜，更与林彪、江青一伙借“文化大革命”来搞乱国家、打倒一切的图谋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和生产的矛盾已是十分明朗、尖锐化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大批坚持生产的领导干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也就势所难免了。

第二，在斗争过程中，鼓吹“革命”的中央文革一班人的矛

头始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表后不久，早就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也已开始动作。11月13日，陈伯达拿出了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明白地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与周恩来所表明观点大唱反调。这个文件稿，便成为双方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的一个导火索。

在11月中旬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期间，陈伯达的稿子遭到与会各地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一致表示支持周恩来的一贯主张，即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进而批驳了陈伯达一伙的谬论。然而，就在正义的力量始占上风之际，形势却突然发生逆转，周恩来、陶铸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遭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非难和攻击。

12月4日和6日，在林彪主持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为听取有关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上，中央文革一伙人针对工交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及形成的文件修改稿，公然提出：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训斥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王力、陈伯达的发言更是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王力说：关于工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文革小组没有抓紧，过去运动开展的情况是两起两落，现在第三次起来又在那里拼命地要把它压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局势。9月上旬，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来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压；后来又产生《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得很凶。这是陶铸同志支持的，这个精神就是堵，就是压！所有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支持工人搞革命！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

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提出许多限制，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都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随即，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的“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是对他搞“突然袭击”^①。

第三，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是在林彪、江青两股势力联合施以高压的情况下受挫的。

以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发言虽然没有公开点周恩来的名，但他们所举的事例全都是在周恩来（也包括陶铸等人）亲自过问和积极支持下搞的。对此，攻击者的心里当然是十分清楚的。而这时的周恩来也不会不明白这伙人的险恶用心，但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暂时组织一次必要的“退却”，以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②。会上，他再次使用了“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③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对形势的看法，指出：十一中全会和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证明，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关于“汇报提纲”，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我让他们写的”，其中，当然是反映了一些客观上的思想动态。他提出，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地抓好生产^④。

对周恩来这种自白加掩护式的发言，林彪及中央文革一伙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用王力的话说，现首要的问题是工矿企业要不

① 以上王力、陈伯达的发言，均据1966年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② 参加这次工交座谈会的有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和国务院所属铁道、水电、化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③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以此表达对运动的看法。

④ 见1966年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深入实践、摸索经验的问题，更不是要“负起责任”、“兢兢业业”地抓生产的问题。对此，从不关心，从不过问生产的林彪，却在这时给工交座谈会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什么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他甚至毫不掩饰地批驳周恩来的发言，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①。

作为当时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讲出上面这番话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压住周恩来、陶铸等代表的正确意见，林彪不啻是中央文革一伙请来的一位“尊神”。在“革命”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林彪的观点十分明确：“革命”是至高无上的，它可以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不管国家和人民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其损失也是“最小、最小、最小”^②。林彪的这个讲话也可以说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林彪、江青等人在“革命”和生产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荒谬论点的一个“开场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上被点名“批判”的陶铸，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保护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毅然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1个月后，陶铸便被中央文革一伙人突然打倒。从某种意义上说，陶铸也是因致力抓生产而“冷淡”了

^① 见1966年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② 林彪在另一场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另外的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革命”才遭此不测的。

总之，1966初冬工交座谈会上的这场斗争，实际是以周恩来、陶铸等领导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正义力量同林彪、江青一伙在要不要借抓“革命”而搞乱生产、乃至不要生产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的一次激烈较量。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革命”影响、干扰、破坏生产的情况已是屡屡发生，成为世人所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这就迫使人们必须去重新认识这场“革命”对于生产到底是在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这样的“革命”越扩大、越深入，他们心中的疑虑、不解、反感和抵触情绪也就越发展、越加重。

(三)

工交座谈会之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大肆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进入工交、财贸、科研等生产业务部门。一时间，“革命”压倒生产、压倒一切业务工作的言论甚嚣尘上，大批产业工人、技术干部、科研人员纷纷脱离生产岗位，“停产闹革命”竟成了“合法”行动。

接着，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全国又掀起了“夺权”浪潮。在1967、1968这两年里，全国各地武斗迭起，派仗不息。极端混乱的局势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工交、财贸、科研等系统的生产业务更是连连受损，每况愈下^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革命”和生产“双轨进行”、互不干扰的最初设想，实际上已根本无法实现；他们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也一次次地在客观现实面前受挫、落空。和其

^① 1967、196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以及1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等均低于1966年达到的指标。

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这时的周恩来不能不对那些自诩是最最“革命”的行为产生极大的怀疑；他这时的言论，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所谓“革命”的劝导和限制上，而是对其事实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安。

首先，周恩来在应付和处理各地各部门生产业务中急需解决的大量问题之际，不断向党内外群众（包括各地的造反派头头）指出“革命”给生产建设带来的巨大损害。仅从1967年下半年里周恩来有关铁路、煤炭等生产情况的言论中，便可知当时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67年5月底，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紧急报告反映：因各地两派纠纷和武斗，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铁路干线均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到6月份，各地造反派仍继续滞留车辆，阻断交通，致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都不能正常运行。

据此，7月初，周恩来在接见河南某群众组织代表时沉重宣布：现在，全国除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①。随后，他又告诫，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问题；由于交通中断，现在煤运不进来，许多工业用电都停了，民用电也停了，整个生产生活都在受这个影响！

9月间，他又在一些场合指出：现运输已降到最低水平，码头货物堆积如山，外国船只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财产损失相当大。他说：“四大”一提倡，大字报一搞，搞到这个程度，谁能料到？（两派武斗）恐怕最大的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到处停产吆！像沈阳、西安这样的大工业城市，有很多援外项目，也搞得停产、停电，我们想起来就难过！

11月下旬，他对黑龙江省某造反派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

^① 此后不久，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也多处堵塞、中断。

……闹“革命”闹了一年半，去年还有库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产。所以不能再打（派仗）了！一次，当周恩来得悉某铁路枢纽站因打派仗滞留了3600多节车皮，而该地区造反派还在反映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时，他不胜激愤地答道：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现在是要火车畅通的问题！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种局面，我们在座的难道心里就舒服？我就不信！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使用“内战”这两个字来概括他对各地因武斗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看法。他曾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

在诸如此类的场合，周恩来极少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讲得更多、更具体的恰恰是“革命”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和破坏。他的这种切身感触，甚至还可以从他与外宾的交谈中窥见一斑。1968年2月，他在接见邻国客人时曾回顾说：一年来，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不休嘛！同年8月，他又对另一批外宾讲：由于运输上的关系，动力上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生产；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有很多指标不是上升的趋势，原来设想今年生产会逐步好转，结果相反。

其二，周恩来在指出“革命”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害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内战”的实质，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极左思潮所导致。

1967年6月初，周恩来向“炮轰”聂荣臻的国防科工委某造反派指出：不能任“打、砸、抢、抄、抓”这股风发展下去，这种无理、残暴的行为根本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现在完全是派别之争、意气之争，是不顾大局的极左倾向、极左错误，这不是个小错误，其表现就是整天忙于打“内战”！后来，周恩来又当

面质问该造反派组织头头：你们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极左思潮派？！

7月25日，他针对钢产量急剧下降、许多炼焦炉熄火的情况，严厉批评鞍钢两派代表：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为派别利益争“气”，而不是为国争光；你们两大派相互“压”的结果，不是把派性组织压垮了，而是把钢铁生产压垮了！

随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强调：要反对极左倾向，警惕极左煽动，其表现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否认一切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当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反复批评、教育下，某些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确有所收敛，一些地区的生产危机也有所缓解。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左”的实践也必然会恶性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罢不能。自1967年冬起，“全面内战”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许多地区的派性争斗不仅仅是客观上带来种种严重后果，而是有目的地、人为地制造一连串的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据1968年2月4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报告：2月2日晚，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枝等被抢走；此外，该干线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数座铁路、公路桥被炸。同日，周恩来就此情况致信毛泽东：像另纸所报破坏铁路情况^①，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之后，经周恩来亲笔修改的、由中央发出的《关于确保援越抗美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命令》中明确提出：对一切破坏运输、装卸的反革命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同年7月，中央连续发布“七·三”、“七·

^① 即2月4日铁道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二四”布告，对大搞打、砸、抢、烧、杀行为的造反派组织采取断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上述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其三，周恩来这个时期一直强调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抓革命、促生产”，是建立在革命的积极作用应体现在生产上，生产是检验一切革命的标准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

1967年，正当“全面夺权”深入进行时，周恩来即向造反派指出：搞革命，就要使工作有起色。难道搞革命就是为争权吗？在后来的一些场合里，他还这样讲过：生产是检验我们各项工作成绩的最好标志；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

同年6月下旬，在接见国家机关各部委代表及出席全国订货会议代表时，他又说：愿作真正的革命派，就要“抓革命、促生产”，眼下首先要保证把订货会议开好，拿这件事考验你们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八月间，他在接见河南等地代表时又指出：现在是黄河防汛时期，这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也是对你们的最大考验。在你们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水利，以此考验你们是否真正愿意革命。铁路上的两派，不管过去认识怎样，都要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都要在保证铁路畅通这个问题上证明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10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期间更加明确地提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从这里不仅看出业务，也看出政治。他说：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与业务要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是革命派。之后，他又具体提出：“革命”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保证上班8小时，不误点，不旷工，不打扑克，在这些问题上作出模范。

1968年1月8日，他在中央对沈阳等铁路局实现群众组织间

的大联合、签订“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的批语中亲笔加上：是否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自己所达成的协议，是对每一个群众组织“是否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大考验。

同年2月2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代表时，周恩来再次强调：每个部门一定要把革命跟业务、跟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每个部门的造反组织如果不抓业务，你就不能算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你就是口头革命家，因为你不去实践嘛！要通过你自身的业务来实行革命，通过实践来考验你是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行动和言论充分表明，在“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日子里，周恩来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解和倡行，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破坏性事实的根据上的，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他长期以来对政治与业务、革命与建设关系的一贯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还曾多次批驳过所谓“‘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的说法，表示从不相信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①。从表面上看，这与他在各种场合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有着很大矛盾的。然而，通过以上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抓生产、抓业务的思想 and 实践的考察，乃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有关政治必须落实在业务上的观点的提出，凡此种种，都无不证明了周恩来思想的连续性、一贯性。他的对“自然而然”论持异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恰恰是他对“文革”时期具有特定含义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所作的特殊诠释和“补充”。

^① 见刘西尧回忆文章：《我当总理联络员前后》，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成员状况的基本分析

王 健 英

中共七大至八大这 11 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解放战争夺取了全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这 11 年之所以成就巨大、胜利辉煌，根本原因是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领导下已经全面成熟，除此之外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素质水平高，领导工作能力强，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周围，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比第六届和此前几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基本状况，深入分析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有助于总结吸取七大至八大中央领导班子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共七大共选出中央委员 44 人，中央候补委员 33 人，总计 77 人^①。其中有 21 人是上一届连选连任，56 人是新当选者。至八大以前各次全会未再增补。以下仅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对 77 名七届中央委员的基本状况进行如下分析。

^① 中共七大实选出中央委员 44 人，中央候补委员 33 人，但当时当选中委的陈潭秋已于 1943 年牺牲；当选候补中委的廖承志正在国民党狱中；后廖于七届二中全会被递补为中委。

一、籍贯分布

77名七届中委成员中，湖南23人，占29.9%；四川8人，占10.4%；广东6人，占7.8%；江苏5人，占6.5%；湖北5人，占6.5%；陕西5人，占6.5%；山西5人，占6.5%；山东4人，占5.2%；福建3人，占3.9%；辽宁3人，占3.9%；江西2人，占2.6%；安徽2人，占2.6%；河南1人，占1.3%；贵州1人，占1.3%；黑龙江1人，占1.3%；内蒙古1人，占1.3%。

上述中央委员会成员分布情况同第六届及前几届中委成员分布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委籍贯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比例减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比例增大。七届中委成员籍贯分布省区16个，较六大以前的11个、第六届的14个有所增加（增加了黑龙江省与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由1人增为3人（满族的关向应、万毅和蒙古族的乌兰夫）。

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是：

第一，全国革命中心及中共中央机关由江西转移至陕北，全国主力红军亦集中于陕甘宁边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日本侵略者占据的华北及华中敌后地区（由三大主力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三个师均战斗在华北敌后战场），党中央派遣大批原在白区工作的优秀干部深入敌后，以及党重视培养使用提拔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地干部。这是北方地区籍贯中委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发展壮大，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至召开七大时共有党员121万人，人民军队12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随着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多，中委籍贯分布面比以前有所扩大，达16个省及地区

是很自然的。

二、年龄结构

77名七届中委成员当选时的年龄情况分别是：60岁以上的2人，占2.6%；50至59岁的7人，占9.1%；46至49岁的14人，占18.2%；40至45岁的31人，占40.3%；35至39岁的21人，占27.2%；32至33岁的2人，占2.6%。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徐特立（68岁）和吴玉章（67岁），年龄最小的是习仲勋（32岁）和曾镜冰（33岁）。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平均年龄是44.4岁。其中新当选的56名成员平均为43.3岁，连选连任的21名成员平均年龄也不过47.4岁。由此可以看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正当中年，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具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时期。

三、家庭出身与社会职业

1、**家庭出身状况**：77名七届中委成员中，出身工人家庭的共2人，占2.6%；出身贫苦农（牧）民家庭共27人，占35.1%；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的共4人，占5.2%；出身小商贩、商人家庭的共5人，占6.5%；出身教师职员家庭的共12人，占15.5%；出身富裕农民家庭的共19人，占24.7%；出身地主绅士家庭的共8人，占10.4%。总计，出身于贫苦劳动者家庭的共50人，占64.9%，居大多数；出身于较富裕和剥削阶级家庭者共27人，占35.1%，是少数。

2、**社会职业（本人成分）**：77名七届中委成员在参加革命前从事的社会职业分别是：工人共8人，占10.4%；农民1人，占1.3%；学生共26人，占33.8%；教师（大、中、小学教员）共29人，占37.7%；记者职员共4人，占5.2%；旧军官共9人，占

11.7%。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第一，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较富裕家庭者在中委成员中占的比例比六大以前的26.8%，及第六届中委的18.7%均高，达到了35.1%。但七届中委中出身于剥削阶级或较富裕家庭的同志均是文化水平较高，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已经工农化的优秀干部。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定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唯成分论”，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重在个人表现，因此才使这些干部得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第二，工人家庭出身和个人是工人成分的七届中委成员在中委中占的比重，同第六届中委成员分别占17.7%、44.8%相比大为降低，仅占2.6%与10.4%。这是由于全党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至农村以后，长期坚持农村土地革命战争和敌后山区抗日游击战争，远离大中城市所决定的。此外，由于原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因受左倾错误影响损失重大，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出身或本人成分是工人的又有近20人叛变、潜逃、变节或脱党，还有5人被开除党籍，也是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工人家庭出身与工人成分者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第三，第七届中央委员中92.2%在青少年时生长于农村，他们参加革命后又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环境中，因此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状况普遍有具体的感性认识。他们中76.7%是青年学生和教师、记者、职员、文化水平较高，参加革命时较年轻，接受新鲜事物快，较容易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而有利于他们坚定地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四、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

1、当选时的文化程度：77名七届中委成员中，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肄业的共25人，占32.5%；大专文化水平（包括4年制师范毕业生、专门专科学校毕业生，及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山

大学等校学习者)的共16人,占20.7%;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毕业、肄业的共23人,占29.9%;相当于中等文化水平(高小、小学毕业后经长期革命实践学习提高者)的共13人,占16.9%。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15人(七大时选出13人,后又增补2人)中,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13人,占86.7%,中等文化水平的仅2人,占13.3%。

2、出国留学工作情况:77名七届中委成员中,赴欧(法、德、比、英)学习或工作过的有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王若飞、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蔡畅、徐特立、廖承志、吴玉章共12人;赴美国学习和工作过的有张闻天、陈郁、饶漱石共3人;赴日本留学过的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王若飞、邓子恢、张闻天、廖承志、李葆华共9人;赴泰国读中学的有曾镜冰1人;赴苏联学习、工作、参观过的共38人。以上人员中如周恩来、王若飞、吴玉章、廖承志、陈郁等还曾到过几个国家。这样,总计七届中委成员出国学习和工作过的共43人,在全部中委会成员所占比重为55.9%,特别是将近半数中委成员均去过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也都有过赴欧美或苏联学习的经历,占73.3%。

3、理论学习经历:77名七届中委成员普遍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读物。其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或工作过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关向应、朱德、李富春、聂荣臻、蔡畅、马明方、饶漱石、吴玉章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有邓小平、陈伯达、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刘伯承、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的有张闻天、王稼祥;在列宁学院学习毕业的有王若飞、李立三、陈郁、董必武、康生、滕代远、陈云、曾山、陈潭秋、刘长胜等。曾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有毛泽东、董必武、康生、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张鼎丞、古大存、陈毅、陈少敏、薄一波、陈赓、李葆华、乌兰夫、刘子久、王从吾等;在红军大学(后改称

抗大)学习工作过的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滕代远、谭政、王维舟、张际春、张宗逊、宋任穷等人;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的有李先念。当选中委成员除陈潭秋已于1943年牺牲、李立三与陈郁在苏联外,全部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整风运动。经过各种院校、各种训练班的学习,特别是经过整风学习运动,七届中委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第一,七届中委成员的总体文化水平是建国前各届中委成员中最高的,特别比第六届中委的总体文化程度(六届中委成员中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仅占48.2%)要高得多。由于文化水平高,七届中委成员普遍能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党的文件报刊等,在分散独立工作的环境中能够自己起草决定、指示、命令,亲自写信,写报告,这对于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独立开展工作及参与中央集体决策十分有利。第二,在出国留学人数上虽然第六届比第七届多,但六届中委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是去苏联出席党的六大并参观的。如就成员中有出国留学经历所占比例看,第六届85人^①中仅有25人,占28.2%,而第七届77人中有43人,占55.9%。并且第七届中委中去过两个以上国家和再次去过苏联的人数比例较第六届要高。过半数的七届中央委员、大多数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曾出国留过学,许多同志不仅在欧美或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生活过,同时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生活过。这使七届中委及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知识面较广,视野开阔,大大提高了中央领导决策的素质与水平。第三,正是由于七届中委成员中的大多数均曾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普遍参加过整风学习运动,

^① 这里的六届中委成员85人包括了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全部成员,有重复任职的不重复统计。

加之普遍具有 20 年左右从基层到高级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党内几次左、右倾错误造成曲折历程,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大大提高了独立分析形势、解决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的能力。这样就使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水平、决策能力大大高于以前各届中央委员会,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周围,在政治、思想、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从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为党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领导中坚。

五、入党时间

77 名七届中委成员中 1921 年 7 月以前入党的 5 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林伯渠、周恩来),占 6.5%;1921 年冬至 1922 年入党的 7 人,占 9.1%;1923 年入党的 5 人,占 6.5%;1924 年入党的 3 人,占 3.9%;1925 年入党的 18 人,占 23.4%;1926 年入党的 14 人,占 18.2%;1927 年 1 至 8 月间入党的 12 人,占 15.5%;1927 年 8 月后入党的 3 人,占 3.9%;1928 年入党的 6 人,占 7.8%;1931 年入党的 2 人,占 2.6%;1937 年 5 月入党的 1 人(吕正操),占 1.3%;1938 年入党的 1 人(万毅),占 1.3%。总计在七届中委成员中,在党的创建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党者共 64 人,占 83.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者 12 人,占 15.5%;抗日战争初期入党者 1 人,占 1.3%。中央政治局 15 名委员中除彭德怀外均在大革命时期入党。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七届中委成员绝大多数入党早,党内生活时间长,对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建设较熟悉。他们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 3 个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过党内多次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种种的曲折。这是七届中央委员会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走向成熟的重

要原因之一。

六、参与领导群众运动和重大斗争的情况

77名七届中委成员当选以前，普遍参加及领导过革命群众运动和重大群众斗争。

1、参加或领导过革命群众斗争情况：(1) 参加或领导过重大学生爱国运动者共70人，占90.9%；其余7人均参加过兵运斗争。(2) 参加或领导过工人运动者（包括白区、苏区工运和抗战时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斗争）、共43人，占55.9%。(3) 参加或领导过农民运动者（包括土地革命、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共74人，占96.1%。只有康生、陈绍禹、陈伯达除外。(4) 先后参加并参与领导过学运、工运、农运3项重大斗争者，共50人，占64.9%。

2、参加、参与领导过武装起义情况：(1)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张云逸、徐特立、陈毅、陈赓、林彪、粟裕、陈潭秋、曾山共16人，占20.7%。(2) 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有毛泽东、滕代远、罗荣桓、谭政、宋任穷、黄克诚、张际春、张宗逊、王首道、谭震林共10人，占12.9%。(3) 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程子华、陈郁、曾山共6人，占7.8%。(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与领导其它各地武装起义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罗瑞卿（以上闽西暴动），郑位三、李先念（以上黄麻起义）、邓小平（百色起义）、彭德怀（平江起义）、王震（湘赣边）、古大存（东江）、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刘澜涛（以上陕北、陕甘边）、王若飞、陈云、刘晓（以上江苏农民暴动）、薄一波（唐山兵变）、王维舟（川东）、李葆华（冀东）、王从吾（冀南）、乌兰夫（内蒙古百灵庙）等共21人，占27.2%。

3、参加过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1) 参加过

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李富春、董必武、林伯渠、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邓小平、萧劲光、黄克诚、陈赓、宋任穷、陆定一、王首道、徐特立、蔡畅、邓颖超、刘晓、张宗逊、谭政、张际春共 33 人，占 42.8%。(2) 参加过红四方面军长征和南下川康边的，有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廖承志（朱德、刘伯承、张宗逊、张际春等也曾部分参加过这段斗争，但不重复统计）共 4 人，占 5.2%。(3) 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有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王震共 4 人，占 5.2%。(4) 参加红二士五军长征者，有郑位三、程子华 2 人，占 2.6%。(5) 参与领导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者，有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古大存、曾镜冰、曾山、陈潭秋等 9 人，占 11.7%。

4、参加、参与领导过革命武装斗争情况：(1) 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李富春、林伯渠、萧劲光、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徐向前、陈毅、陈赓、彭德怀、张云逸、林彪、黄克诚、程子华、张宗逊、罗瑞卿、粟裕、陈伯达（任过国民革命军教官）共 22 人，占 28.6%。(2) 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武装斗争和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除陈绍禹、康生、陈伯达、李立三、陈郁、吴玉章 6 人外，71 人均参加过，占 92.2%。

5、其他情况：(1) 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抗战时期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两年以上者，共 45 人，占 58.5%。(2) 曾经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者，共 15 人（任弼时、彭真、刘少奇、陈潭秋、关向应、刘子久、刘晓、陈少敏、王若飞、陈伯达、薄一波、刘澜涛、陈赓、廖承志、马明方），占 19.5%。(3) 当选以前曾经受到党内错误处分和不公正对待的有 12 人（毛泽东、刘少奇、陈郁、邓小平、曾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王首道、陆定一、萧劲光、陈潭秋），占 15.6%。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由于自六大至七大全党经历了长达17年之久历史上最艰苦、曲折、复杂的伟大斗争，从而使第七届中央委员获得了前6届未曾经历过的更丰富的实践锻炼和多方面考验，他们的实际领导经验也更为丰富。

七、七届中委成员当选前所属的工作系统与最高职务

(一) 当选前所属工作系统

1、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叶剑英、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绍禹、秦邦宪、彭真、陆定一、蔡畅、徐特立、李富春、吴玉章、陈伯达和谭政共18人，占23.4%。

2、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高岗、林伯渠、贺龙、陈云、徐向前、萧劲光、王维舟、习仲勋、乌兰夫等9人，占11.7%。

3、国民党统治区党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陈潭秋（当选时未获知其牺牲消息）、马明方（被监禁）、古大存、廖承志（被监禁）、曾镜冰、刘晓、刘长胜共11人，占14.3%。

4、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华北各战略区党及军队领导机关：前方总部有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张际春；太行区和一二九师有邓小平、刘伯承；太岳区有薄一波、陈赓；冀鲁豫（含冀南）区有宋任穷、王从吾；晋绥边区和一二〇师有关向应、林枫、吕正操、张宗逊；晋察冀边区有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李葆华；山东和一一五师有林彪、罗荣桓、黎玉、万毅。以上共22人，占28.6%。

5、华中和新四军各部：有饶漱石、陈毅、张云逸、曾山（以上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粟裕（苏中），谭震林（淮南），黄克诚（苏北），邓子恢、刘子久（以上为淮北），郑位三、李先念、陈

少敏（以上为鄂豫皖），王首道、王震（以上为湘鄂赣），张鼎丞（苏南），共15人，占19.5%。

6、在苏联的：有李立三，陈郁2人，占2.6%。

（二）当选前担任的党政军最高职务

1、原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关向应、彭德怀，共13人（原政治局成员邓发、凯丰落选）。

2、中央军委成员：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副主任谭政。

3、中共中央机关主要部门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妇委书记蔡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另有兼职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康生，中央统战部部长陈绍禹，中央城工部部长彭真，《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

4、各中央派出机构主要领导人：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书记、代书记董必武，副书记王若飞，妇委书记邓颖超；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副书记、代书记程子华，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冀鲁豫分局代书记宋任穷；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副书记黎玉；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副书记、代书记饶漱石，组织部部长曾山，城工部部长刘长胜；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

5、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大区（省）党委书记：薄一波（太岳区）、王从吾（冀鲁豫区）、粟裕（苏中、苏浙区）、谭震林（淮南区）、黄克诚（苏北区）、刘子久（淮北区）、邓子恢（淮北区）、李

先念（鄂豫皖区）、王首道（湘鄂赣区）、曾镜冰（福建省委）、刘晓（江苏省委）、廖承志（香港工委）等。

6、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各师、各军区军政首长：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滕代远；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张际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联防军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一二九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太岳军区司令员、政委薄一波；冀鲁豫（含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

7、新四军军部和各师、军区军政首长：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副军长代军长张云逸，副政委、代政委饶漱石；第一师师长兼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军区政委谭震林；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政委兼淮北军区政委邓子恢；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兼鄂豫皖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张鼎丞；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

8、其他当选者：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吴玉章（延安大学校长）、王维舟（三八五旅旅长兼陇东警备区司令员兼陇东专员）、习仲勋（绥德地委书记、独立第一旅兼绥德警备区政委）张宗逊（三五八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郑位三（原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华中局驻鄂豫皖边区代表）、陈少敏（鄂豫皖边区党委副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乌兰夫（蒙族、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万毅（满族）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兼滨海支队支队长）、马明方（原陕西省委书记兼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新疆狱中）、李立三（在苏联，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陈郁（在苏联，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以上共12人。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第一，77名七届中委成员中80%以上来自敌后抗日战场或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第一线。始终或较长时间

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的约 10 人，居少数。第二，党中央各派出机构、各相对独立坚持抗战的抗日根据地、各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主要部门的主要领导多数当选为中委，这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利于加强对分散于敌后各地，相对独立的大战略区党、政军事事务的领导。

八、当选后的工作系统与任职情况

(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情况 (因变化较大, 主要统计 1945 年 9 月至 1948 年 3 月间的情况)

1、工作系统分布:

(1) 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 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陈绍禹、廖承志、徐特立、陈伯达, 共 9 人, 占 11.8%。

(2) 驻国民党统治区之中共代表团: 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秦邦宪、陆定一、邓颖超、吴玉章、刘晓、刘长胜、曾镜冰, 共 11 人, 占 14.5%。

(3) 陕甘宁及晋绥边区: 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贺龙、关向应 (病逝)、马明方、王维舟、张宗逊, 共 8 人, 占 10.5%。

(4) 晋冀鲁豫解放区: 有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宋任穷、王从吾、陈赓, 共 9 人, 占 11.8%。

(5) 华东解放区: 有饶漱石、陈毅、张云逸、粟裕、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黎玉, 共 9 人, 占 11.8%。

(6) 东北解放区: 有彭真、林彪、陈云、张闻天、高岗、罗荣桓、李富春、林枫、黄克诚、萧劲光、吕正操、谭政、程子华、李立三、王稼祥、蔡畅、陈郁、古大存、乌兰夫、万毅等, 共 20 人, 占 26.3% (王首道系后调东北)。

(7) 晋察冀解放区: 有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李葆华等, 共 4 人, 占 5.3%。

(8) 中原解放区: 有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王首道、王

震、刘子久等，共6人，占7.9%。

2、任职情况：

(1) 中央书记处书记5人，中央主要部门负责人8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5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3人。以上除去兼职实际15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均兼职）。

(2) 中央派出机构主要领导人：重庆（南京）局2人，西北局2人，晋冀鲁豫中央局3人，华东局3人，东北局6人，晋察冀中央局3人，中原局2人，晋绥分局1人，华中分局3人，上海分局2人，南满分局2人，东满分局1人，北满分局1人，西满分局2人，冀察热分局1人。以上7个中央局、8个中央分局的书记、副书记总计34人，除去重复兼职数实际31人（周恩来有兼职，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并先后兼北满、南满分局书记）。

(3) 中央局部长、大区（省）党委书记，共15人。

(4) 各大军区、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西北野战军3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2人，晋冀鲁豫军区6人，华东军区5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9人，晋察冀军区3人，中原军区5人，共33人。除去重复兼职数实际11人。

(5) 其他：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鼎丞（苏中军区司令员）、陈赓（太岳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万毅（纵队司令员），共4人。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第一，七大后抗日战争很快胜利，为贯彻七大路线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猛烈发展扩大人民革命力量，七届中委成员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阶级决战的第一线。留在党中央及军委总部的只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及陈伯达、陈绍禹等。中央领导人在1947年3月撤出延安后，亦分别赴华北或留在陕北，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下继续领导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分散于各解放区的中委成员，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故80%以上身

兼党、政、军或党、军或党、政几任于一身，担负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而又独挡一面的重要领导职务。如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均兼大军区或二级（兵团级）军区政委，各大军区、野战军司令员或兼中央局书记、第一书记，或兼中央局第二书记、副书记等。这既适应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和高度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又有利于迅速坚决地贯彻党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和号令，保证分散的各战场能在党中央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下，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夺取阶级决战的胜利。第三，当选中委成员中部分较年轻的地委、区党委书记和旅长、师长，经过短短两三年实践锻炼，均已被提拔到各中央局、大军区和野战军的主要领导岗位。这充分证明了七届中委成员中的绝大多数素质水平是很高的。

（二）建国后至八大前七届中委成员的工作系统与任职情况

七届中委成员至建国时，除因公殉职、牺牲和病故的以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6年前所在工作系统与任职情况是：

1、中共中央及直属机关（共53人次，包括兼职，下同）：

（1）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1950年病逝）、陈云（后增补）。

（2）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副秘书长谭震林，宋任穷、林枫、刘澜涛、马明方，共6人。

（3）中央书记处第一至第四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共5人。

（4）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农村工作部及华北、东北、华东、西南、西北等5个地区工作部的部长、副部长（包括兼职及前后任），共23人次。

（5）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前后两任）任弼时、陈伯达，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

（6）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副书记王从吾。中央监察委员会（1955年3月选出）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

王从吾。

2、中央人民政府（共54人次）：

(1) 国家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高岗。

(2) 政务院后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共12人。

(3) 政务院政务委员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李立三、李富春。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林伯渠、罗荣桓、彭真。

(5)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罗荣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6) 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共21人。副部长、副主任4人。

3、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共51人次）：

(1) 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2)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4人。

(3) 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12人。

(4) 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正副总长5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2人，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人，总干部部正副部长2人，训练总监部部长1人，武装力量总监察部部长1人，海军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炮兵副司令员共4人，志愿军总部3人。

4、全国政协和工青妇等全国领导机构（共16人次）：

(1) 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一届）、周恩来（二届），副主席周恩来、董必武、彭真，常务委员郑位三。

(2)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副主席李立三、刘长胜，书

记处书记陈少敏，常委兼文教部部长刘子久。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

(4) 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

(5)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程子华，监事会主任曾山。

(6)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

5、各大行政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包括中央局，行政委员会，大军区领导人）：

西北：彭德怀（第一书记、主席、军区司令员）、习仲勋（第二书记、副主席代主席、军区政委）、马明方（第三书记、副主席、副政委）张宗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西南：邓小平（第一书记、副主席、军区政委）、刘伯承（第二书记、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第三书记，第一副主席、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第一副书记、副主席、军区副政委）、张际春（第三副书记、军区副政委）陈赓（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西南局常委、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华东：饶漱石（第一书记、主席、军区政委）、陈毅（第二书记、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第三书记、副主席、军区副政委）、张鼎丞（第四书记、副主席）、粟裕（副主席、军区副司令员）、曾山（副主席、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康生（华东局副书记）。

中南（1949年6月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同年12月改称中南局及中南军区）：林彪（第一书记、主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第三书记、第一副主席代主席、军区第二政委）、罗荣桓（第二书记、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叶剑英（第三书记、副主席、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谭政（第一副书记、军区第三政委）、李先念（副书记、副主席）张云逸（副主席）。

东北：高岗（第一书记、主席、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副书记、第一副主席，军区第一副政委）、林枫（第二副书记、第一

书记，第一副主席、代主席)。

华北：薄一波（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聂荣臻（第二书记、军区司令员）、刘澜涛（第三书记、主席）、王从吾（常委、第二书记）。

6、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1) 北京：彭真（书记、当首任市长聂荣臻调任后又兼市长）、聂荣臻（市长）、李葆华（副书记）；(2) 上海：饶漱石（书记）、陈毅（第一书记、市长）、刘晓（第二书记）、刘长胜（第三书记）、黎玉（市委秘书长）、曾山（副市长）；(3) 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兼军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4) 内蒙古分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与政委乌兰夫；(5) 山东分局书记、省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康生；(6) 江苏省省长谭震林；(7) 浙江省委书记、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谭震林；(8) 福建省委书记、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张鼎丞；(9) 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与政委李先念；(10) 湖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省委副书记王首道；(11) 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云逸，副书记兼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古大存；(12) 广西省委书记、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与政委张云逸；(13) 云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宋任穷，省政府主席、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赓；(14) 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军区政委马明方；(15) 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与政委王震；(18) 辽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闻天。

从上述统计中看出，建国后全国党、政、军、群各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各大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直辖市和重要省、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均全部或部分由七届中委成员担任。这从组织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地位，并为在全国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同时也进一步显示出七届中委成

员素质和能力水平绝大多数非常之高。他们深受全党的爱戴和拥护，非常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

综合对上述各方面基本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以往各届相比，整体德才素质水平是最高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全面成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方面衡量堪称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七届中委成员当选时平均年龄44.4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又有相当阅历与20年左右的革命实践。七届中委成员中58至68岁的6人，32至37岁的11人，38至53岁的60人，老、中、青三者结合，比例适当。特别是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高，过半数的人曾出国留学过，很多人曾经是青年教师和学生，知识面较广，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思想开放。经过长期实践锻炼和培养，同时也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他们普遍具备了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斗争的本领和独立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工作的才能。正是通过七届中委的正确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路线，得到了顺利贯彻，党和人民才能从胜利走向新胜利。

（二）七届中委成员的推选充分发扬了民主，认真贯彻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充分体现了“要搞五湖四海”，增强全党团结的精神。由于七大是在全党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的基础上召开的，与会代表经过整风学习，提高了理论思想水平，分清了路线是非，总结吸取了历史上左、右倾错误以及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因此，七大代表在七届中委成员选举过程中能够顾全大局，正确贯彻“任人唯贤”原则，从有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出发，选举时既以全党工作需要为主，又适当兼顾到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各地区、各工作系统，各个“山头”，并注意团结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七届中委成员中曾在苏区和红军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占大多数，但长期在白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亦被选入。抗日战争时期党

所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和各主力师与各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当选。不仅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和秦邦宪继续当选为中委，就连一再犯严重路线错误仍未认真检查错误的陈绍禹，也被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内。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种处理和安排是正确的，是有重大积极作用的。

（三）中央委员的分布构成符合当时全党工作和斗争的实际，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又有利于加强党对各地区工作的领导。由于抗战时期全党工作重心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各根据地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同党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大多相距甚远，交通受阻，联系不便。为了加强领导，党中央先后选派大批干部包括中央及军委机关的同志，深入敌后参加领导工作。随着抗战的发展，党的组织和人民军队“越抗越大”。经过8年艰苦锻炼及激烈战火的考验，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干部。当时，他们因实行一元化领导制度而大多一身兼任党、政、军多项领导职务，既要领导党的建设、政权建设、进行统战工作，又要组织指挥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高了全面领导的才能。七届中委成员大多数是分散在敌后抗日战场的主要领导干部，来自党中央及军委机关的占少数，这种结构是恰当的、符合当时实际的，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和历史需要的产物。

我所了解的张冲 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见

西门宗华^①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扩大侵略的咄咄逼人的紧迫形势，以及全国上下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实现其在西安事变期间所作的抗战诺言。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苏联的帮助是不可少的。于是决定派其政府要员杨杰和张冲分任正副团长，于7月下旬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谈判求援。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王叔铭等军事将领。

此次出访的代表团副团长，当时深得蒋介石和陈立夫倚重的张冲恰是周恩来在国统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一个主要对象。周恩来和博古得知张冲将使苏的消息后，在一次会见中，周恩来便给了张冲一张名片，希望通过他的名片将张冲介绍给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他还在这张名片的背面与博古联名写上这样一段介绍文字：“张冲同志奔走国共合作，卓著勋劳，请以同志关系接待。”

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莫市郊外苏联高级军官的别墅区内，苏方并派来一名联络员安德列夫负责代表团的

^① 西门宗华（1905—1984）上海松江县人，长期从事中苏文化交流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张冲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访问时，为中国驻苏大使馆官员，曾为张冲与斯大林的会见做了牵线工作，本文是他生前的回忆。

对外联系。张冲行装甫卸立即将周恩来给他的介绍名片送交到安德列夫手中，再请他转交王明。岂知日复一日，两个星期过去了，音信杳然，有如石沉大海。到了第三个星期，安德列夫竟将名片退还给张冲，并说“我们不知王明其人，也不知他这人住在何处，只得奉还原件，表示歉意”。张冲闻言当即愕然，感到事情已是颇为难办了。

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访问时，正值我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任职，而张冲与我一向相熟。我认识张冲，是在1932年我去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登记时，那时他负责领导该所。张冲懂俄语，知道我留苏很早且擅长俄语后，便从留俄学生招待所每月2000元经费中拨出800元叫我办一杂志，取名为《中国与苏俄》杂志。其后我独力经营这一杂志，前后足有3年。这样，我就和他结下了友谊。张冲在名片被退回后，惶急之中来找我，问我还有什么方法使用这张关系重大的名片。我当时深感只要有利于抗战不管怎样也要出一臂之力，便一口答应设法转交名片。当时，虽然苏联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最主要的分支部，但苏联为适应国际形势，将党与党的关系与国家间的关系相区别，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更显得与党际交往泾渭分明。安德烈夫奉命“退票”，显然是这个原因。但我当时决定不顾这些，破例写信给共产国际原东方部领导人米夫。米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代行校长职务，并曾在该校执教列宁主义课程，我曾是他教的学生之一。于是我打算携信和名片直接到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共产国际总部，设法打通关系。作为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驱车前往共产国际总部，连使馆的驾驶员都表示难办，因为那里是禁区。但我说我有要事，必须前往，责任由我来负。当我来到共产国际驻地时，我告诉传达室要找米夫，传达室用电话向里面询问，回答“米夫不在”。我想可能现在与我留苏之时已相距8年，人事变迁，米夫或已调离或有其它变化。但我还想再试试，于是又与里面用电话交涉，说我有一张给王明的介绍名片，可以递交否。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接电

话的人竟是康生。他允许我递交名片后告知我明天再打电话联系。第二天一早就电话联系，约定在当天下午三四点钟在阿尔巴特广场（这是离中国大使馆不远的的一个著名广场）有人等候张冲和我。我和张冲如约前往等候，不一会儿，有辆车开了过来。我尚没有注意，但张冲很精明，一眼看到此车，便急速登上自己的车，驱使自己的座车跟在来车之后疾驶而去。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冲的汽车也开走了，但我不敢马上离开，于是仍在那守候了很久，最后扫兴返回使馆，闷葫芦不知如何打开。后来得知那辆来车上坐的是王明。当张冲到达王明的住处后，王明和其妻孟庆树殷勤招待，双方谈到深夜两三点钟。当夜张冲专程来到使馆告诉我，他已会见了王明，并对我在广场长时间等候深表歉意。

经王明安排，斯大林设宴招待了杨杰和张冲。席间斯大林表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只要动员人民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坚持并把日本侵略者打败的。杨杰、张冲则秉承蒋介石之命请求苏联出兵东北，或派出军事力量支援中国保卫南京。但那时日本侵略军已兵临南京，斯大林听了杨、张的陈述后，对他们谈及的请求未作任何明确表示。事后杨杰、张冲认为，从斯大林接见及与他们的谈话印象中看出，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的使命是可以争取实现的，虽则苏对我之援助不一定是取苏联直接出兵的形式。获悉这样的结果后，我不能不为能促成这一有利于中国抗战事业的会见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 抵达北平的第一站

柳林溪^①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主席率党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移至北平，抵平后的第一个休息地方是颐和园。颐和园，也就成了毛主席进抵北平的第一站。

那时，我是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3月24日早晨，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市政府的秘书长薛子正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说有要事。

我赶到市政府，见到薛秘书长，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白有什么事，他就对我说：“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马上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的。”

在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看完信后，望着我。他那张非常严肃的脸上，隐约流露出几分神秘和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说：“今天晚上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县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休息。”

^① 柳林溪（柳汁青），河北省肥乡县柳庄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入党，1931年至1934年曾任中共肥乡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肥乡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1月21日，受命负责接管颐和园工作，并于接管后任颐和园管理处主任。1983年从北京市园林局离休。本文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后在颐和园停留时，所经历的接待工作的一段回忆。

“保证完成任务！”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站起来答道。

毛主席率党中央从西柏坡移至北平，这标志着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一个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令人激动的消息啊！

组织上把接待毛主席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一定做好接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

天色刚黑，我就来到颐和园东大门等候。

北平，早春的夜晚寒气逼人。这时的颐和园门前冷清得很，我在大门外踱来踱去，但身上觉得暖融融的，没有感到一点寒意。

当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之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了！

第一辆车是毛主席的车，我连忙上前迎接毛主席。毛主席下车后，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我有些激动地答道：“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相继下车了，毛主席一挥手，说：“走吧！”我领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毛主席就握着我的手，问道：“你认识我？”“认识。”我说。

毛主席，我怎么能不认识呢。1943年我在延安先后在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学习，多次聆听他的报告。1945年他为了争取和平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欢送、迎接我都参加了。我们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纺过线、开过荒，在瓦窑堡搞过农场，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我简要地将我在延安学习和工作时那几年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毛主席的几句话，使我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毛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我向毛主席告辞，离开了景

福阁。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正守在电话机旁值班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毛主席要我到景福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颐和园的情况。

毛主席关切地问：“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生活怎么样，有困难没有？”

我将颐和园的情况一五一十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多是年岁大的，青年人很少，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全园职工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就要过春节了，职工无法生活，更无法过年啦。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让大家过了个年。”

毛主席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听到这里便赞许地说：“那很好。”接着又说：“对原有的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还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这样就不好了。”

我回答毛主席：“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毛主席听到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主席还对公园管理和园林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不但要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休息。

在颐和园停留休息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便于25日离开

了颐和园，去参加在西苑机场举行的入城阅兵式。

关于毛泽东主席进抵北平的时间，众说不一。有人说是1949年3月25日，因为这一天，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也有人说是3月26日，因为从这天起，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便在香山住了下来。但据我所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是3月24日晚上就进了北平。那晚，他们就住在颐和园景福阁内。

光阴似箭，岁月流逝。这件事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王福建整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九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